

红旗



报

一九五九年

19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五九年第十九期 ★

目 录

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刘少奇(1)

高举党的总路綫和毛澤东軍事思想的紅旗

闊步前进林彪(16)

中国人民大团結和世界人民大团結邓小平(26)

論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大跃进李富春(38)

不断发展我国各民族的大团結烏兰夫(48)

共产党员应当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应当是

党的同路人康生(51)

中国人民胜利的国际意义王稼祥(56)

歌颂人民公社陶铸(61)



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为“和平和社会主义問題”杂志而作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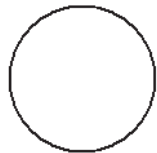
刘 少 奇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到现在，已经有十周年了。

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繼續。伟大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紀元，开始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功，以苏联为主力軍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欧亚許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都表明社会主义的兴起和資本主义的沒落是不可抵抗的历史規律。中国革命的胜利，进一步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中国革命把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战綫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使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制度遭到致命的打击。新中国参加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結成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在欧亚两洲連成一片、团結友好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对于一切曾經遭受过或者正在遭受着帝国主义压迫的落后国家的人民，中国革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們感觉到，中国人能够做到的，他們也应当能够做到。所有这些，清楚地說明，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力量对比，已經有了新的变化。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彻底的解放，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設能够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从而迅速地改变着中国貧穷和落后的面貌。

中国在全国解放后的最初三年間，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順利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經济的任务，使工农业生产一般地达到了和超过了旧中国的最高水平。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国人民执行了第一个五年計划，使工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一，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使現代工业在国民經济中的比重，从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二十六点



七提高到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四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中国建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出现了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六，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今年又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跃进。同一九五八年相比较，今年工农业总产值，计划增长百分之二十，工业总产值计划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六，农业总产值计划增长百分之十。钢、煤、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金属切削机床、棉纱、原木、粮食、棉花等项工农业主要产品的计划产量，都将完成、超过或者接近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在一九六二年完成的指标。中国社会生产力这样飞速的发展，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当然更不是在旧中国的条件下所能梦想的。

马克思说得完全正确：“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在中国，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没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会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迅速发展，就不会有象今天这样全国人民精神焕发、意气昂扬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局面。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希望和异常光辉灿烂的前途。

中国人民十年来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的总路线、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的胜利。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反复地阐明了这样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①一方面，中国革命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正象俄国的孟什维克一样，他们用一道“万里长城”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隔开，看不到这两个革命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民主革命中看不到有把这个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的前途。另一方面，“左”倾机会主义者又类似俄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要在民主革命阶段内消灭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曾导致中国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同“左”右两种机会主义相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方针是：一方面，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的革命任务明确地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把这两个革命密切地联系起来，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尽一切可能为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以便在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不停顿地立即展开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1952年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646页。



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紧紧地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是保证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由民主革命胜利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任何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都提不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纲领，都不可能把中国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就是我们党领导民主革命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概括，叫做“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①。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大国，它的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贫农和雇农又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农民问题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旧中国的反动统治是极端野蛮的，人民群众处于完全无权的状态，进步的革命家大批地受到逮捕和杀戮。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深入农村，领导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斗争，达二十二年之久。党采取了坚决依靠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力量、发动农民自己救自己、自己打倒地主、取得土地、保卫土地的群众路线的方针（党的这个方针一直继续贯彻执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土地改革中），而不是采取与此相反的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资产阶级的方针，就使党在农村中建立了强大的可靠的革命堡垒，建立了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把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和革命纪律性逐步提高到接近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水平，并且从他们中间取得了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所需要的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后备。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的革命战争，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的土地改革和经济文化建设，实际上是为准备全国胜利而进行的长期反复的伟大的演习。在这些演习中，教育了群众，锻炼了军队，积蓄了革命力量，培养了干部，并且使党的领导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经验。

因为在民主革命中建立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最密切的联盟，我们就能够正确地解决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我们正确地区别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他们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封建主义的保护者和同盟者，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凶恶的敌人，必须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排挤，要求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因此，他们有参加革命或者对革命保持中立的可能。但是，他们有软弱性，有革命和反动的两面性，经常处于动摇的中间地位。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在一定的条件下联合他们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另一方面，又要同他们的妥协性进行斗争。实行了这样的统一战线政策，我们就达到了壮大革命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的目的，巩固地保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团结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①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割断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的联系，右倾机会主义者和混淆这两个革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都不懂得农民问题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因而也不能正确地处理资产阶级的問題。右倾机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采取投降主义的路綫，把民主革命看成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不去依靠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而主要地依靠同资产阶级的統一战线；并且对于资产阶级只进行联合，而不进行必要的斗争。这样，他们就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在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情况下，就使革命遭到失败，使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挫折。就是在革命胜利的条件已经成熟，需要抓住时机，进行决定胜负的斗争的时刻，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也不敢争取胜利，甚至要阻止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联合各种小资产阶级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并且错误地把中间力量作为主要的打击方向，否认在民主革命中有联合或者中立各种中间力量的必要和可能。他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只进行斗争，不进行适当的联合，更不愿意利用敌人的具体矛盾，集中力量去反对最主要的敌人。结果也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使无产阶级陷于孤军作战，使革命不可能得到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忽视农民的革命要求和革命毅力，在反动统治时期，不承认我们能够 在农村站得住脚，能够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能够经过农村包围城市并在最后达到夺取城市的目的。所以，“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调换位置。例如王明同志，他是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左”倾路綫的主要代表人，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又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同“左”、右两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团结了全党，从而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使一个革命胜利接着一个革命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彻底地粉碎了旧中国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粉碎了它的压迫人民的官僚机构和军阀机构，从而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了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的人民共和国，这就顺利地实现了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革命的最主要问题即政权问题上，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的终结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国无产阶级在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巩固地建立了自己对国家的政治统治权，因而不需要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再进行一次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是由于我们党在民主革命中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的最后目的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在民主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就十分注意地确立了并且巩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结果。

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国外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国内的主要矛盾则将由中国人民同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让位给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



之間的矛盾，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間的矛盾，并且提出了解决这个矛盾的一系列的根本政策。中国人民在全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虽然还必须繼續解决民主革命阶段遗留下来的任务，主要是在全国很大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来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任务，但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实际上已經在一九四九年开始了。中国无产阶级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通过国家的力量，没收官僚资本，牢牢地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积极地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并且使这种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

在一九五二年年底，当恢复国民经济和肃清封建残余的任务基本完成的时候，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总路线，规定了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在提出这条总路线的时候，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着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我们一方面同企图扼杀新中国的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团结了全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另一方面，在国内，一步不停地继续进行着社会改造和建设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这条总路线，是引导中国社会由当时的既有社会主义经济、又有资本主义经济、又有个体经济的复杂的经济结构，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的路线。当时，有些人否认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性。他们或者企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的老路；或者企图把革命停止下来，长期保持既有社会主义经济、又有资本主义经济的现状。党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线肯定要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而否定了从右的方面来的各种错误观点。同时，党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线又肯定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是逐步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必须是逐步的，从而否定了企图在一个早上就把资本主义消灭得干干净净的“左”的错误观点。

我们在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点的步骤。

我们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三个互相衔接的步骤。第一步，在土地改革以后，紧接着广泛地发展了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互助组织。这种互助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第二步，在这种互助运动的基础上，紧接着又发展了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和主要的生产资料还是私有的，这种合作社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我们把它叫做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就是实行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的集体化，建立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我们党内曾经有过不同观点的争论。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工业化水平还很低，还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因此，要很快实现农业合作化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这种观点已经被事实驳倒了。我们在基本上没有机械化的条件下，完成了农业合作化的任务。

有一种观点，认为迅速实现合作化，势必降低农业生产。这种观点也被事实驳倒了。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和合作化以后，我国的农业生产不但没有降低，反而不断上升，并且上升得相当快。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这样迅速地实现农业合作化，会妨碍农民的团结，就是说，除了富农以外，富裕中农也会不满甚至反对我们，而支持我们的将只有比较贫苦的农民。这种观点也被事实驳倒了。由于我们对富裕中农采取团结的政策，对富裕中农入社的大农具和牲畜采取逐年偿还代价的政策，由于合作社生产的逐年上升，绝大多数富裕中农对合作化是基本上满意的。

总之，事实证明，我们紧接着土地改革之后“趁热打铁”，不停顿地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进行农业合作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好政策。如果我们在土地改革以后把革命停顿下来，让农村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发展起来，听任农民向两极分化，那在以后要实行合作化，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就会困难得多。

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是怎样实现的呢？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而达到社会主义国有化的目的。一般说来，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是对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实行供给原料、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对私人资本主义商业采取让它们经销代销的办法；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是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由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一定年限内给资本家一定的年息。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我们党内也发生过一些不同观点的争论。

有一种观点，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只应当加以利用，而不应当加以限制和改造，或者说我们限制得过多、改造得太急了。这实际上是企图让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保持下去。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在同一个社会中，不是这个战胜那个，就是那个战胜这个，长期并存是不可能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又是逐步改造，又是实行赎买，又给资产阶级选举权，又给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以一定的政治地位，“太妥协了”。他们认为，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我们还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统一战线，是原则上不许可的。他们要求用对待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那样的政策去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即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或者从国民经济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简单的、迅速挤垮的政策，并且剥夺资本家的选举权。这



些人忘記了，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是对无产阶级有利的，这是马克思和列宁多次說过的。至于无产阶级专政并不一定要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的问题，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書中也講过：“限制选举权的问题是某一国家中实行专政的特殊问题，而不是专政的一般问题。”^①

我們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是采取了“阶级调和”的政策呢？当然不是。这种怀疑是完全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誤解或曲解。实际上，我們为解决这个矛盾而采取的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是无产阶级的极其坚定的阶级政策，同“阶级调和”政策沒有丝毫相同之处。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完全証明了这一点。

总之，我們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减少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并且在逐步改造的过程中有条件地利用了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而結果是我們能够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并且要把资产阶级分子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当然也是完全适合中国条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好政策。

我們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这种逐步过渡的办法，并不象有些人所說的，拖长了改造的时间。相反，改造进行得很快。到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我們已經实现了农业的高级合作化，而紧跟着在一九五六年，就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与此同时，也实现了手工业的合作化。这就是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到七年的时间内，我們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上解决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誰战胜誰”的问题。我們在解决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几乎完全沒有引起什么破坏，工农业生产一直是上升的。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是結束了呢？有人認为是結束了，再不需要进行任何革命了。我們認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結束，还必须繼續进行革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在现在，我国的资本家还拿定息，在經濟上作为两个阶级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没有完全消失。即使资产阶级在經濟上作为一个阶级完全消灭以后，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而同社会主义制度相抵触。特别是资产阶级右派，还会利用这些情况，伺机向社会主义举行进攻，阴谋复辟资本主义，有时他們的进攻还会达到非常猖狂的程度。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决不能局限于經濟战线上，还必須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澤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7頁。



矛盾的問題”这个著作中明确地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說：“无产階級和资产階級之間的階級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争，无产階級和资产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态方面的階級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間誰胜誰負的問題还没有真正解决。無論在全人口中間，或者在知識分子中間，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馬克思主义仍然必須在斗争中发展。”^①

无产階級和资产階級之間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都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种斗争象波浪的起伏一样，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有时候表现尖锐，有时候比較緩和。这种斗争，要到资产階級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才会熄灭。

为了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毛澤东同志提出了要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質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去对待和处理这两类矛盾，并且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一九五七年，我們党发动了調整人民内部关系的全党全民的整风运动，进行了反对资产階級右派猖狂进攻的斗争。結果是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建設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大地打击和削弱了剝削階級在政治領域和思想領域中的反动影响。在这个基础上，我們党提出了“政治挂帅”的方針，加强了党对經濟工作及其他各种工作的领导，調整了中央与地方、领导与被领导以及其他方面的相互关系。同时，党又向全国人民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揚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口号，鼓励革命性的試驗和群众性的发明創造，领导群众修改或者废除那些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为了进行教育革命，党又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階級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針。由于采取了这一切革命的措施，毛澤东同志所說的那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暢、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我国日益广泛地发展起来。在一九五八年春天，我們党及时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鼓舞下，全国人民斗志昂揚，意气风发，就在一九五八年实现了国民經济的大跃进，在全国农村中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成績。这是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而彻底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所得到的結果。

在区别两类矛盾、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些問題上，在我們党内也有过不同观点的爭論。我們党在毛澤东同志领导下，坚持了正确的路綫，批駁了党内各种錯誤的观点，因而就能够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事业中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① 毛澤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26—27頁。



有人說，在过渡时期存在着敌我矛盾，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是不可理解的。他們認為不要划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两类矛盾。这种观点是錯誤的。划清这两类矛盾，对于如何正确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如何正确地处理劳动人民内部不屬於阶级斗争范畴的各种矛盾，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实践的意义。

在現在的中国，不只是存在着敌我矛盾，还存在着大量的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例如：由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間还存在着差别而产生的矛盾，由于劳动人民中間遺留着剝削阶级的习惯上和思想上的影响而产生的矛盾，等等。至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矛盾，經濟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間的矛盾，以及人們由于認識上的正确和錯誤、先进和落后的差别而产生的矛盾，則是从来就存在，現在也存在，并且在以后还要永远存在下去的，只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些矛盾的性質和解决方法已經和阶级社会中根本不同了。認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或者在阶级完全消灭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后，人民内部就不再存在矛盾的观点，是违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完全錯誤的观点。

社会上所存在的各种矛盾，都必然地要在我們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中表现出来，也必然地要在我們党内的生活中反映出来。因此，我們必須学会正确地認識并且正确地处理这些矛盾，才能彻底消灭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完成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知識分子的改造，并且調整人民内部的关系，把我們的事业順利地推向前进。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矛盾的統一和斗争，矛盾的解决，仍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果不注意划清这两类性質不同的矛盾，就会产生几种錯誤傾向：看不见敌我矛盾，或者把敌我矛盾看成人民内部矛盾，不知道对待敌我矛盾必須采取专政的方法，即孤立、分化、惩办和镇压的方法，而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处理敌我矛盾，这就必然要犯錯誤。反之，看不见人民内部矛盾，夸大敌我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不知道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須采取民主的方法，即“从团結的愿望出发，經過批評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結”的方法，而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說，不用說服的方法，而用压服的方法，这也必然要犯錯誤。此外，这两类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如果矛盾轉化了，而我們的处理方法不随之而轉化，也必然要犯錯誤。我們的同志在这个問題上犯錯誤的具体事例是不不少的，因此，認真地認識这个問題是十分必要的。

有人說，我們采取“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就是采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策，即所謂“自由化”的政策。也有一些人担心，我們实行这样的方針，会助长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造成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所有这些人都想錯了。

我們实行这个方針，是因为我們对党的领导，对人民群众的大多数，对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具有充分的信心。我们采取这个方针，绝不是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政策，而是实行无产阶级的极端坚定的阶级政策。实行这个方针，是为着促进科学、艺术和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是为着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时候，实行这个方针，是为着便利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战胜资产阶级，肃清它的影响，而不是容许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这个方针也适用于在政治方面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仍然要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思想仍然要在同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斗争中扩大自己的阵地。对于人民内部各种不同的意见，必须让它们充分发表出来，采取批评、说理的方法，进行充分的辩论，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不错，资产阶级会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一切优势都在无产阶级方面，资产阶级利用这个口号来进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对我们说来并没有什么可怕。我们从来不承认，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是合法的。我们从来就公开宣布，在我们的园地里，社会主义的百花是应当盛开的，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是应当锄掉的。问题在于：究竟采取什么方法才能够有效地消灭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呢？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思想的影响还没有肃清以前，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毒草总是客观地存在着的，并且总是经常以冒充社会主义香花的姿态出现。当人们缺少同毒草进行斗争的经验的时候，他们常常不善于分辨香花和毒草，甚至还会把伪装了的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当做社会主义的香花来加以欢迎。在我国文化工作的某些部门中，曾经有些同志因为害怕长出毒草，只准许他们所认为是香花的东西生长，其结果，许多对社会主义有益的香花被误认为毒草而受到了压制，相反地，许多有害的毒草反而能以伪装的态度在暗地滋长起来。这些同志的想法是错误的，幼稚的。其实，潜伏地下的或者以伪装面目出现的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对无产阶级专政说来是更为有害的。让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以本来面目长出地面，并不是坏事，相反地，是很好的事。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锻炼人民群众识别毒草的能力，提高人民群众同毒草作斗争的本领，从而达到放社会主义百花、锄反社会主义毒草的目的。在一九五七年，我们就是采取这个办法同资产阶级右派作斗争，依靠人民群众击退了右派的猖狂进攻。

事实证明，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恰恰是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中的领导地位，丝毫也没有削弱这个领导地位；是提高了人民群众同反动思想作斗争的能力，丝毫也没有削弱这种能力。这是在我国条件下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策。

一九五八年，我国人民开创了一个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局面。对于大跃进的事实，人们是



无法否認的。但是，有人說，一九五八年我国的大跃进不是正常的現象，在經濟建設中組織群众运动，只会造成生产秩序的混乱，即使一时能够跃进，也必然引起国民經济比例关系失調的現象，因而国民經济的跃进局面不可能持久。这种观点是完全錯誤的。

在經濟建設中組織群众运动，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自觉的事业，不發揮人民群众的創造力，就不可能有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建設。我国解放了的、团結起来和組織起来的六亿五千万人民，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創造力量。在去年大办鋼鐵的群众运动中，几千万人废寝忘餐，不計报酬，表现了热情奔放、干劲冲天、敢于創造新生活的共产主义精神，結果就使我国鋼鐵工业能够逐步合理地分布在全国各地，并且加速了鋼鐵工业发展的速度。目前布满全国的无数中小型水利工程和几十万个中小型企业，也都是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發揮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办起来的。由于发动了群众，开展了“比先进、赶先进、学先进”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許多大型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劳动生产率有了迅速的提高，許多基本建設工程，大大地節約了投資，縮短了竣工的时间。事实証明，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到社会主义建設战綫上来，就能够造成我国国民經济突飞猛进的局面。

这样的群众运动的出現，絕不是一时的偶然的現象。迅速地改变我国贫穷和落后的面貌，是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强烈願望。他們既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了解放，他們的这种願望就必然要表现为行动，成为不可抗拒的高屋建瓴之势。在正确的领导下，这种群众运动一定能够成为推动我国經济跃进发展的最积极的、經常的因素。我們的群众运动是在党的集中领导下进行的。党的领导是把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結合起来，把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和物質鼓励結合起来，而以政治为灵魂、为統帅。因此，在党的领导下，就能够形成和經常地保持社会主义建設的广大群众性的运动，最大限度地發揮人民群众在建設事业中的积极性，使广大人民群众經常地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并且依靠工人、农民和工程技术人员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来不断地增加现代化生产工具和发展现代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只要我們这样做，我国国民經济跃进的局面就能够持久地保持下去。这是毫无疑問的。

群众运动发展起来以后，是会要破坏一些原有的生产秩序的。但是，它所破坏的是不利于生产发展的旧秩序，而在同时又建立了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新秩序。在一九五八年，我們通过群众运动，在企业中調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行了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实行了领导干部、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員几方面在党委领导下密切結合的制度，同时有领导地改革了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結果就大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生产水平。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凝固的东西。有领导地改变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就是充分發揮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要这样做，就要依靠人民群众，同一切束縛生产力发展的传统的习惯势力作斗争，不断地調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之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只要我們这样做，就能够推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就能够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就能够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的跃进。

列宁说过：“必须认识到，资产阶级总是非常虚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实际上，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甚至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①从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大跃进中，我們真正看到在我国出现了这样的群众性运动。非难群众运动的人，他们是站在群众运动之外，指手画脚，向群众泼冷水，散布泄气、埋怨和悲观的情绪。他们对待群众运动，完全不是共产党人所应有的满腔热情的态度，而是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

有人说，采取跃进的速度，会违反客观经济规律，会引起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但是，我們的事实完全不是象这些人所说的。我們的跃进，恰恰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轨道上出现的新事物。客观经济规律是不能违反，而必须遵从的，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也不可能有什么国民经济的跃进发展。我們党的总路线包括一整套“同时并举”的方针，就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后来大家给这套方针一个通俗的名称，叫做“用两条腿走路”。采取这样的方针，就可以在经济建设的跃进中避免各种片面性，例如：只重视工业而忽视农业，只重视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只重视大型企业而忽视中小型企业，只重视中央对工业的统一管理而忽视地方发展工业的积极性，只重视洋法生产而忽视土法生产，等等。这就是说，我們党的总路线正是要求在高速发展国民经济的时候，把客观可能性和主观能动性统一起来，注意各种比例关系，遵从客观经济规律。从去年以来的大跃进中，我国国民经济各部类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总的说来都是协调的，相适应的。虽然出现了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失调现象，但是很快就被我們发现并且克服了。这种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失调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出现了也是容易克服的。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和几个“同时并举”的方针，就可以保证不会发生长期的、全局性的比例失调现象。

当然，我们必须做好国民经济的计划工作，尽可能使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互相协调地向前发展。我們的要求是：又要有高速度，又要有综合平衡。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在高速发展中有较多可能出现某些不平衡现象。但是，我們不应当前怕狼，后怕虎，贪图安宁，用不适当的降低速度的办法来达到平衡。只要我們注意总结经验，认真研究客观经济规律，在高速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58—459页。



度中求平衡是能够做到，也是应当做到的。

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可能每年都是一样的。有的年份较高，有的年份较低，这是正常的现象。可以肯定，我们的经济总是逐年增长的，而且我们是能够保持跃进的发展速度的。

非难大跃进和群众运动的人，同时也非难我国农村的人民公社。他们认为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超过了社会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群众的觉悟水平”。这种非难，没有任何站得住的事实根据和理由。

认为人民公社的发展没有客观必然性的观点是不对的。他们没有看到，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是中国几亿农民群众为着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它是去年大跃进中农业生产大发展、农田水利大发展、农民办工业的积极性和农民社会主义觉悟大高涨的产物。我国广大农民群众看到，要办水利，办工业，综合发展农业的各种经济，在各种较大规模的生产事业上实行劳动协作，所有这些都超出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要求在原来合作社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建立某种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组织形式，这就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拥有几千户以至上万户的人力，几万亩以至十几万亩的土地，能够更合理地安排人力和利用自然资源来发展农村经济，并且有利于逐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农民群众所迫切需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和集体福利事业，在人民公社中也能够大大发展起来。由于举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等集体福利事业，节省了大量劳动力，特别是使大量妇女劳动力得到了解放。农村人民公社虽然还只成立了一年，但是它在实践中已经充分显示了它的伟大生命力。所以，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合乎中国农民要求迅速发展农村经济、改变农村贫穷和落后面貌的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是在中国条件下合乎历史规律的群众运动。这样的运动，不是什么人喊一下就会出现，也不是什么人反对一下就会垮台的。

有人以为，现在的人民公社还是实行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那就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没有什么区别，就没有必要组织人民公社。他们看不到，人民公社在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因而二者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人民公社内部，实行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其中所说的农，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业），在组织生产的同时又组织生活，实行国家在农村的基层政权机构和公社的管理机构的合一，这些都是原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没有的。尤其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现在虽然还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生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是基本的，公社的所有制是部分的；但是，这部分的公社所有制是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没有的，它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全民所有制成分。由于公社可以逐年从生产队中提取一部分积累用于社办企业，由于社办企业的发展，并且由于国家对公社的援助，公社所有制部分必将逐步扩大，以至转变为公社所有制是基本的，而生产队的所有制只是部分的。目前的公社所有制虽然还是部分的，



但正是这部分公社所有制代表着人民公社的伟大希望和伟大前途。只要公社的部分所有制转变为公社的基本所有制，那就为我国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人民公社在分配制度方面，现在基本上实行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同时也实行部分带有按需分配的萌芽性质的供给制度，这也是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没有的。许多人民公社采取适当部分的供给制度（一般说来，占社员总收入中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它在目前的主要作用，是保证丧失劳动力的人和儿童的生活。这是在我国农村实行社会保险，帮助多子女家庭以及其他负担较多的家庭的一种很好的办法，是适合于农民群众现在实际生活的需要的。当然，这还不是实行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原则。

有人以为，人民公社的性质只能是共产主义的，必须完全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否则，就不能称为人民公社。因此，他们认为，在现在条件下办人民公社只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他们对于人民公社作了完全机械的理解。他们不了解，我国农村现在的人民公社是一种基层的社会组织形式，具有上述的各种特点，因而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容纳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不同程度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不同水平的生产关系。对我国说来，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既适合于目前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也将适合于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既适合于目前的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将适合于将来的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度。有理由相信，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在我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后，也将是一种适当的基层社会组织形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公社制度是一种发展过程。在我国农村中，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能够推动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将反过来促使人民公社制度在内容和形式上得到发展。有了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以后，我们在实际上找到了在我国条件下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以至将来在农村中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如果认为人民公社一成立就能够实现公社的全部理想，这是错误的。如果因为人民公社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就认为人民公社办得太早，最好不办，办了也要让它散掉，更是完全错误的。

非难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是非难我们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些非难党的总路线的人，是些什么人呢？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就是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代表。在国内外敌对势力恶毒地攻击我们的时候，他们竟借口我们工作中某些早已被党中央发现并且已经纠正了的缺点，否认我们工作的伟大成绩，把我们的伟大事业说成似乎是黑漆一团。他们企图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阻碍今年的继续跃进，阻碍党的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我国目前的主要危险。同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克服右倾机会主义，扫除它的影响，是我们党当前的一个主要任务。

我们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得到的成绩是伟大的。现在，我们正在胜利地进行反对右倾



机会主义的斗争。广大人民群众正在响应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号召，掀起了一个新的增产节约运动的大高潮，有力地回答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同时也回答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攻击。

我们的伟大事业正在胜利地前进。我们的党不只是同中国人民共命运、同呼吸，而且我们从来认为，我们的事业是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部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给了我们以很大的帮助，全世界劳动人民和各国进步势力也给了我们以很大的同情和支持。我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日益增强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团结。我们的口号是：“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依靠这两个伟大的团结，我们的事业是无往而不胜的。

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证实和新胜利。曾经有过一种说法，认为马克思主义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不适用于经济落后的国家，只适用于西方，不适用于东方。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胜利后，又有一种说法，好象马克思主义只适用于东方国家，不适用于西方国家。所有这些说法，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和他们的仆从们的奇谈怪论。事实上，自从马克思主义出现以来，不论在经济先进的国家，还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每一次历史事变和每一次革命的考验，恰恰是反复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各国人民群众的斗争和革命，都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但是，不管各国革命有多大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一切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共同的历史轨道，正象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不能离开自己的轨道一样。

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毛泽东同志有一个著名的概括的说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一贯努力的就是，使自己能够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东方大国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且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取得胜利的结果，无论如何，这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当然，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带有自己国家的特点。但是，某些重要的特点也可能在别的一些国家中重新出现。就这方面来说，中国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国际意义的。

让我们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前进！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高举党的总路线和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

林彪

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同全国人民一起，热烈庆贺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全民的节日。

十年时间，在历史的进程中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但是就在这十年中，我们的国家紧接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社会主义在各个方面基本上战胜了资本主义。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占人类四分之一的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进入了社会主义。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之后，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我国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使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一九五八年，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议，党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展开了工农业生产 and 文教事业的大跃进，使我国有可能提前三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在去年秋季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农村迅速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不满一年，人民公社已经巩固地站稳了脚跟，走上了健全发展的道路，并且日益显著地发挥了它的优越性。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种史无前例的高速度发展和辉煌成就，雄辩地证明了：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的创造历史的力量和智慧是无穷无尽的。但是，帝国主义无时无刻不在破坏和梦想推翻我们。我国建国不久，美帝国主义就在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同时霸占我国的领土台湾，妄图首先占领朝鲜，进而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果，他们可耻地失败了。在我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面前，帝国主义者胆战心惊，惊慌失措，对我国进行了最恶毒的诬蔑和攻击。现在，他们又可耻地失败了。中国的历史车轮，不顾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阻拦和破坏，正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飞跃前进！中国人民强大起来了！

在过去的十年中，国防战线也如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其他战线一样，取得了伟大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了全国大陆。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打败了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的军队。美帝国主义这个纸老虎，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被戳穿了。我军在解放沿海岛屿、保卫祖国边防海防和空防的斗争中，在惩罚金门蒋军、准备解放台湾的斗争中，在平定西藏反动势力叛乱中，胜利地执行了祖国人民的重托。在国防前线和纵深战略要点，进行了巨大规模的现代国防工程建筑，使我国开始成为一个具有比较完整体系的现代防御设施的国家。军队本身，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把我军建设成为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在苏联和各个兄弟国家的援助下，经历了我军建军史上一次新的巨大转变：改善了军队的技术装备，对军队的指挥、编制、训练、制度等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现在，我军已由单一兵种发展成为诸兵种合成军队，陆军的各主要技术兵种得到显著的加强，一支强大的空军建立起来了，海军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在我军的现代化建设中，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发扬了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在各种工作中贯彻执行了群众路线。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全国大跃进的鼓舞下，军队工作也展开了一个干劲冲天的全面大跃进。我们的国防力量，除了拥有一支政治坚强的、有现代技术装备的常备部队以外，还建设了一支拥有几亿人的民兵队伍。有了这个队伍，在帝国主义胆敢向我国发动进攻的时候，就可以实行全民皆兵，配合常备军使敌人陷入全民战争的火海。我军在从事本身建设的同时，还经常地大规模地参加了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革工作。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人民解放军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保卫者，又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①十年来，我军忠诚地执行了这一光荣任务。

十年来，我们的国家是处在由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变革中；我们的军队在军事上由单一兵种过渡到现代的多兵种合成军队，这也是一个大飞跃。在这种情况下，一系列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提到我们面前。主要是：在军队的现代化阶段，政治挂帅还是重要的吗？具体地说，关于政治工作、思想工作的地位，关于军队人员应当如何对待国家经济建设 and 群众运动，关于怎样正确地处理军队内部关系以及怎样进一步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这些，都成为建军新阶段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十年来，由于我们比较恰当地处理了这些重大问题，因此才取得了上述的成绩和胜利。在建国十周年的今天，我们要讲的主要也是这方面的一些体验。

二

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我军指战员长期以来为之英勇奋斗的崇高理想。即使在民

^①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人民出版社，第29页。



主革命阶段，党也从不放松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教育自己的军队。我军的大多数同志，不但在民主革命时期表现坚决勇敢，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也是为社会主义而英勇奋斗的，是社会主义的坚强战士。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同志，虽然他们对社会主义有某种向往，也抱有实现它的愿望，却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的觉悟，以至当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开始的时候，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的思想往往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不少的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才逐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思想准备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起民主革命是广泛得多、深刻得多的革命，它要消灭任何种类的剥削制度，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一革命的每一个步骤，都对我国几亿人民的生活和思想发生重大影响；而社会上的各种思想动向又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到军队中来。一个革命军人，如果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充分的思想准备，缺乏认真的自我改造，那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站稳立场，也就不可能自觉地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这样，当社会主义真的到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真的要结束的时候，他就会感到突然，甚至迷失方向。这样，资产阶级思想的毒菌，就会在我党我军抵抗力薄弱的这一部分肌体中传布开来，对我党我军起着腐蚀和分裂的作用；我们在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就会遇到来自内部的阻力。

在我们军队内部，并不存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对立的阶级，但是却存在工人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反映。就现时来说，旧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造虽然已经基本完成，但是尚未彻底完成；社会经济制度虽然变了，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政治活动却依然存在，它的社会基础虽然正在缩小，但是还有它一部分社会基础。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种社会基础。它在一部分人们中间还有市场，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蠢动起来。在人们的头脑中，不是社会主义思想占领阵地，就是资本主义思想占领阵地。因而，在过渡时期，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始终是军队建设的重要课题。我军的一切工作，我军的现代化建设，都离不开这个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这种政治思想斗争，是象波浪一样起伏的，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阵，再低一阵，直到今天，这一斗争还远没有熄灭。只有到阶级最后完全灭亡时，这种斗争才会止熄。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工作，是不能一劳永逸的，也必然要随着阶级斗争的起伏，时而要进行细水长流的经常性的理论、政策教育；时而要进行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是通过教育和斗争一步一步地占领与扩大的。每一个革命者必须在思想领域里进行不断革命。十年来，我们所进行的三反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运动、肃反运动、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以农业合作化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以及以人民公社、大跃进为中心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学习等等，就是卓有成效的政治思想工作。



当然我們并不满足于这些成績，并不認為有了这些成效，就可以減輕今后的政治思想战綫的任务。

在进行政治思想战綫上的斗争中，我們始終認為，对于絕大多数同志來說，主要是一个教育和提高的問題。我軍指战員是热爱社会主义、坚决为社会主义奋斗、經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驗的。坚持资本主义道路，存心反对社会主义的，只是极个别的混入軍內的階級异己分子。但是，由于我軍官兵絕大多数来自农民，一些同志有时难免从小生产者暫时的、局部的利益考虑問題，而对社会主义变革中的一些問題認識不清；少数同志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风浪中，也难免受到资产階級、小资产階級特别是富裕中农的思想影响，而表現立場不够坚定。这些情况是存在的，如果任其发展，资产階級思想就会在我軍中泛滥起来。因此，我們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思想工作。这种思想問題，是属于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不能用对待敌我矛盾的方法、压制打击的方法，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軍队的政治工作、思想工作十分重要，是万万放松不得的。“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綫”，这是我軍几十年来在革命实践中所証明的真理。毛澤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書的按語中又进而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綫。在社会經濟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①这句话当然同样适用于軍队。在我軍的現代化建設中，我們自然要十分注意改善装备、掌握技术，但是一定还要注意另一方面，而且是主导的一面，这就是不要忘記政治，要強調政治。我們的軍队是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軍队，我們要用政治指导軍事，用政治指导日常工作。政治是最根本的东西，政治工作、思想工作不做好，其他一切工作就都无从談起。十年来我軍各項工作所以能获得巨大成績，首先是社会主义思想开的花結的果。加强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教育，加强社会主义和党的总路綫的教育，并且使这些教育同当前革命斗争的实践、同軍队成員的思想变化密切联系起来，不断地从人們头脑里扫除残存的资产階級思想和小资产階級思想，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在今后，仍然是我軍建設的一項基本任务。

三

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中誕生和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来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看成是自己的事。当人民群众起来破坏旧制度，为改造社会和自然的面貌而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人民解放军总是紧紧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满腔热情地給人民以巨大的支援，并直接投身

^① 中共中央办公厅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版，第123頁。



到火热的群众运动中去，使自己也能获得最大和最好的锻炼。当敌对势力企图阻挠和破坏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时候，人民解放军总是挺身而出，为群众撑腰。同时，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又总是反过来大大鼓舞和教育了军队，成为锻炼和提高军队政治觉悟的革命熔炉。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击败在装备上在力量对比上较自己远占优势的敌人，正是因为它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武力，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①人民解放军和人民群众这样的一种关系，是由人民解放军的本质和它的建军宗旨决定的。在民主革命时期如此，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同样如此。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当民主革命业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新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要来临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及时地向我们提出了伟大的召唤：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

全国大陆解放以后，军队的任务由主要是作战转为主要是训练，由散驻农村转为进驻营房，军队和人民群众直接接触的机会减少了。当时，有些同志就以为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有所分工，军队的训练任务又很繁重，似乎军队可以不必参加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和国家经济建设，可以不必参与“地方上”的事了。我们及时地批判并坚决地纠正了这种错误观点，继续发扬了长期以来我军既担任打仗、又做群众工作、又参加生产的三大任务的光荣传统，并且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不同时期的需要，从各个方面展开了支持群众运动的活动。十年来，凡属重大的社会变革，重大的群众运动，人民解放军是无不积极支持和热情参加的。极端仇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帝国主义代言人，把我军积极参加人民群众革命运动，说成是“武力镇压”，这实在是最荒谬可笑的。其实，帝国主义的老爷们，正是惯于使用他们的反动武力，野蛮地镇压国内人民和一切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的。他们对我军的这种造谣诬蔑，只不过是表示他们害怕我们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同六亿多人民的亲密团结，妄图用谎言来掩盖他们自己的丑行而已。

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显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党的总路线很快为群众掌握，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形成了史无前例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对于这种伟大的群众运动应该怎样来看待呢？是站在运动之中满腔热情地支持他们呢？还是站在运动之外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运动的对面反对他们呢？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完全相反，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长期教导下，紧紧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了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从亲身体会中完全懂得：大跃进和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1952年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470页。



民公社化运动有其客观的物质基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党和毛泽东同志集中了群众的意志和创造，推动了这个伟大运动向前发展。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广大劳动人民之所以表现出如此高涨的革命热情和社会主义觉悟，正是因为他们决心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面貌，摆脱“一穷二白”的状况，决心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完全理解人民群众这种崇高的愿望和奋发的热情，他们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并深深地为人民群众的伟大意志所感动。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完全懂得：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虎视眈眈，总在伺机破坏，这就更要求我们时刻警惕，坚决贯彻和保卫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以便高速度地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只有国民经济高速度的发展，加强我国国防的现代化才有希望，我国人民的幸福和安乐才有保障。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完全懂得：害怕群众运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本性，他们在运动面前专门挑剔缺点、夸大缺点，目的是散布松劲、泄气、埋怨、悲观情绪，否定成绩，否定党的总路线。我们则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做得轰轰烈烈。不要群众运动，抓住一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性的而且是迅速克服了的缺点反对群众运动，就是不要前进，不要革命。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在亲身参加群众运动中，首先看到的是亿万人民的冲天干劲和伟大成绩，这是群众运动的主流和本质。以人民公社来说，我们不仅看到了人民公社这个新生的社会组织的旺盛的生命力和无比的优越性，它对发展国家经济文化和提高人民生活的巨大作用；而且认识到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结为一体的人民公社，当帝国主义一旦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又是最便于实现全民皆兵，支援前线，保卫祖国，陷侵略者于灭顶之灾的强大后盾。对于人民群众这种推进社会主义进程，同时推进国防建设的革命创举，每一个真正关心祖国富强的人怎能不衷心拥护、热情歌颂呢？当然，象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大规模的迅速发展的群众革命运动，由于经验不足，发生一些缺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绝不是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缺点；而是同成绩相比，缺点是如此之少，缺点的克服是如此之快，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群众运动的艺术是如此高超，如此值得敬佩和学习。

前面我们讲过，人民解放军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军人不应当脱离政治，而要重视政治和努力学习政治。而群众运动、社会斗争的实践，就是丰富的政治。我们每时每刻都要保持和人民群众的接触，从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吸取营养，提高自己。军队指战员积极地、主动地参加国家建设和群众运动，可以开阔眼界、丰富头脑、增强群众观点和劳动观点，可以结合丰富的实践提高理论政策水平，还可以从地方干部那里学习阶级分析的方法和生动活泼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经验已一再证明：军队参加群众运动，对广大指战员来说，是一种最生动、最丰富、最深刻的政治课程。哪个部队重视这一点，哪个部队的干部、战士政治思想



进步就比较快；哪个部队忽视这一点，哪个部队的干部、战士就一定政治闭塞、眼界狭窄，思想赶不上形势。前几年，有些同志把参加群众运动、帮助人民生产看成成为一种额外负担，认为只有出操上课才叫训练，参加社会主义斗争的实践就不是训练，反而会妨碍训练，就是“得不偿失”。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

四

在我军技术装备不断改善，掌握技术、提高技术较之过去更为重要的现代化军队建设阶段，人的因素还是有决定意义的吗？有些同志认为：现代战争和过去的战争不同，过去我军的武器装备是低劣的，为了打胜仗，就只好着重依靠人、依靠人的勇敢和智慧；现代战争打的是技术、是钢铁、是机械，在这些东西面前，人的作用要退居到第二位。他们看重的只是机械，并且还企图把革命的士兵也变成机械的没有革命首创精神的人。我们和他们相反。我们认为：装备、技术固然重要，但是人的因素更为重要。技术也是要去掌握的。人和物应当统一起来，并且要以人为主导因素。我们经常考虑的，是怎样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官兵群众的主动性问题。十年来，我们在建军工作中特别注意密切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和在一切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它是从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军阀制度、建立民主团结的制度开始建军的。我军有最有权威的指挥制度，又有革命大家庭中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亲密关系；我军是集中性最大、纪律性最强的战斗组织，又是最富有民主生活的队伍；我军的成员都按着自上而下的统一号令行事，又惯于在各种工作中走群众路线。官与兵、集中与民主、统一号令与群众路线，看来是十分矛盾的事物，可是在我们的军队中却统一得极好。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长期以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十年来，不论我军的武器装备、组织制度有什么变化，我们都坚持了并且不断地发展了这个光荣传统。

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官兵关系弄得好不好，不是技术方法问题，而是态度问题，是不是尊重士兵人格这个根本态度的问题。我们一直认为官和兵只是革命队伍中分工的不同，在政治上和人格上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军官不是超出在士兵群众之上的特殊人物。只有军官爱护士兵，士兵尊重军官，官兵互相尊重，才能建立平等友爱的关系，达到官兵一致的目的。这个一致，可以产生无穷的战斗力量。一九五八年，我军响应了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开始实行军官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的制度。这个制度，是由各军区、各军种兵种司令员、政治委员等将军同志带头实施的。下连当兵的军官和士兵一起操作，一起劳动，一起住宿，一起娱乐，听班长指挥，自己不懂的，就象小学生一样向班长向士兵请教。他们很快就和士兵打成



一片，成了士兵的知心朋友。各部队普遍反映，哪个连队有军官当兵，哪个连队的政治情绪就特别饱满，士气特别旺盛。军官以身作则，士兵对军官的爱护也无微不至，问寒问暖，尽量减轻军官的体力劳动。军官当兵，对军官本身也有很大帮助，能够在劳动中、在同士兵相处中树立以平等待人的共产主义风格，防止官气，加强群众观念；能够从战士的角度来检验领导机关的指示、决定，检查领导作风。虽然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只有一年，但已经可以看到，它将使我军官兵进一步地结成一体，脉脉相通、心心相印，成为无敌的力量。

毛泽东同志历来就十分重视民主生活的发扬，他在这方面作过很多指示。他说：军队应当实行一定程度的民主，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强了战斗力。他说：应当在每一部队举行拥干爱兵运动，号召干部爱护士兵，同时号召士兵拥护干部，彼此的缺点错误，公开讲明，迅速纠正，这样就能达到很好的团结内部的目的。他又说：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示的这种民主的工作方法、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首先在人民军队中执行，并且取得了丰富经验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里，士兵是被管理者、被领导者，同时又有权参加管理，在工作中出主意、想办法；干部是管理者、领导者，同时又受群众的监督，在工作中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遇有矛盾，便采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加以调整。这样，便增强了团结，提高了士气，巩固了纪律，发扬了广大官兵的积极性、创造性。在这一方面，十年来我们有很大的发展。中国人民志愿军把民主运用到高度现代化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也是卓著成效的。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地下长城”——坑道工事，就是上下结合、集中了群众智慧的产物。我们还把民主运用到现代化的军事训练中。结果，凡是群众路线走得好的部队，训练成绩都很优异。一九五八年，出现了以“一专多能、一兵多用”为目标的掌握军事技术的群众运动。以改善技术装备为中心的技术革新运动也广泛地开展起来，涌现了许多合理化建议和有价值的创造发明。此外，整风运动以来，在全国范围普遍采用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民主形式，也同样运用到军队。这种形式最适于发动群众进行自我教育，解决内部矛盾，发扬群众的主动性，增强群众的责任心。

我们所实行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有领导地进行的。任何时候我们都反对无政府状态和平均主义。我们在军队中推行民主生活，也随时随地考虑和照顾到军队的特点。我们把民主当作手段；增强团结、巩固纪律、提高战斗力，才是我们的目的。我军的官兵，有一致的政治目的，有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因此，我军的民主生活始终能够沿着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我们应当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大多数。别有用心的入要想利用民主来破坏我们的军队，不但各级领导不容许，广大指战员也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五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我军广大干部的坚强党性，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防事业获得胜利的最大保证。我们深深体会到，十年来在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方面，和以往战争年代一样，每当我们遇到重大关键问题的时候，都是从党和毛泽东同志那里找到了正确方向，得到胜利解决的。例如：关于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方针的确定；关于国防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的正确处置；关于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和正确的战略指导；关于解放台湾的斗争和福建前线作战的各项政策的决定；关于强大的常规部队、特种技术部队和民兵武装相结合，准备实现全民皆兵的方针的提出等等，所有这些，无一不是党和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的结果。

毛泽东同志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里说过：“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①在同一篇文章里，他又说：“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②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建国十年来和战争时期一样，始终是坚决地拥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成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忠实可靠的工具，成为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坚强的保卫者。因此，人民群众总是把极大的荣誉和热爱给予人民解放军；而帝国主义者和各种反动派，总是把人民解放军对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无限忠诚看作是对他们最不利的事情。我们在军队工作的干部和共产党员，必须时时刻刻警惕敌人的阴谋：既警惕拿枪的敌人的进犯，又警惕各种“糖衣炮弹”和来自内部的破坏。在军队工作的干部和共产党员，负有一种特别重要的责任，这就是兢兢业业地保卫人民的利益，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保卫党的领导，不使它遭受任何敌人的侵袭和破坏。这个责任首先要求军队的干部和共产党员虚心学习，改造自己，使自己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坚强的党性。

党性不是抽象的东西。对于一个在军队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干部来说，坚强的党性，应当表现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全心全意为党的纲领和路线奋斗。这就要时时刻刻关心和注意政治形势、政策、路线等方向性的问题，站稳立场，分清是非，避免在大是大非面前摇摆不定，迷失方向。个人和党的位置一定要摆对。要绝对服从党，不要有个人野心；要严守纪律，处处以党的团结为重，不要背着党另搞一套；要大公无私、老老实实，不要以伪善手段沽名钓誉；要谦虚，不要骄傲；要勇于接受批评教育，向一切错误倾向作斗争，不要拒绝批评、坚持错误。总之，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只要它一露头，就要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1952年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535、534—535页。



坚决批判、努力克服，不要放过一絲一毫。我軍广大干部的党性，在党和毛澤东同志的不断教导下，是在不断地增强。正因为我們有了大批具有坚强党性的干部，党对軍队的领导才能得到贯彻，才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

党和毛澤东同志曾經一再指出，增强党性的根本問題，是以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代替存在于人們头脑中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是需要經過长期的艰苦的努力的。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如果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去观察和处理問題，就必然产生錯誤。离开世界观的改造，就不能很好地增强党性锻炼。認真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和毛澤东同志的著作，确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我軍每一个干部和共产党员必尽的义务。

在我們庆祝十年来国家建设和軍队建设的輝煌成就的时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在繼續高速度地向前跃进，国际形势也更加向有利于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伟大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都是一片蓬勃景象；全世界反殖民主义的解放斗争正在风起云涌；而帝国主义陣营内部則矛盾重重，籠罩着一片阴影。毛澤东同志关于“东风压倒西风”和“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来”的英明論断，正为越来越多的事实所証实。緩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巩固世界和平的可能性日益增长，我們应当坚决地为和平而奋斗。尽管美国一小撮好战分子仍然力图繼續加紧冷战，一次又一次地制造事件向社会主义陣营和民族独立运动挑衅，某些帝国主义分子正在不断地进行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恶意煽动，对此我們必須保持足够的警惕；然而，我們坚信新生力量一定战胜腐朽力量。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必将繼續以豪迈的步伐向前跃进。无论国内和国际的形势，現在都是一片光明。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为十年来我們祖国的灿烂成就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战斗号召所鼓舞，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領袖毛澤东同志领导下，必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加輝煌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向社会主义胜利进军的年代里，也一定会在它的战斗岗位上，坚定地执行党的每一个付托，圓滿地回答全国人民的期望！讓我們繼續高举党的总路綫和毛澤东軍事思想的紅旗，鼓足干劲、力爭上游，为巩固国防、解放台湾、维护和平、建设祖国而奋勇前进！



中国人民大团结和 世界人民大团结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为苏联“真理报”作)



十年前，中国人民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伟大的胜利。十年来，中国人民在同国内外敌人的斗争方面，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能够取得这一切胜利，是依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同时也是依靠了中国人民同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

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在国内，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在国外，要联合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他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十年来，我们始终一贯地执行了这个纲领。

革命使中国几亿人民团结起来。经过民主革命，经过社会主义革命，随着革命的不断展，中国人民的团结愈来愈巩固了。在长期的斗争中，广大的中国农民把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看作是他們可以永远信赖的唯一的力。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工农联盟，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中国各民族的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象一个巨人一样。过去，帝国主义者嘲笑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现在，他们不能不在团结起来的中国人民面前吓得发抖了。

中国共产党坚定地信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一条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身上的枷锁，只有靠人民群众自己的双手来打破；人民的幸福生活，只有靠人民群众自己的



双手来创造。从这个真理出发，我们的基本工作方法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切工作走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有领导地展开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把群众的智慧和意见集中起来，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将近三十年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归根到底，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和组织到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间，形成了民主革命的广大群众运动。这个群众运动的集中表现，就是人民革命战争。这是动员了几亿贫苦农民，并且受到他们全力支持的人民革命战争。因此，我们终于能够打败敌人，取得完全的胜利。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十年来，我们在国内所做的事情，除了彻底完成民主革命阶段所遗留下来的任务以外，也可以概括起来说，就是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和组织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线上来，形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广大群众运动。我国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这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强有力的武器。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使广大的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它建立在亿万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的基础上。因而，忽视人民群众的主动性，认为一切事情只要自上而下地通过国家的力量去进行，不再需要组织群众运动，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群众运动贯彻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方面。广大的群众运动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能够进行得彻底而迅速，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能够多、快、好、省地进行。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集中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结束小生产者所有制、彻底解放社会生产力的强烈意志。革命的每一个重要步骤，都是在广泛的群众运动中向前推进的。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我们迅速而顺利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紧接着，我们又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取得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在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面前，一切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迅速地土崩瓦解；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迅速地成长起来。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在广泛的群众运动中向前推进的。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而得到彻底解放的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满怀信心地要在最艰巨的任务中考验自己的力量。他们的迫切愿望就是，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经济，使我国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逐步赶上那些向来以“先进”自夸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认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热情地支持人民群众的这种完全合理的愿望，积极地领导人民有组织地行动起来。党和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九年已经指出：根据我们的条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当是很快、而不是很慢的。在一九五七年超额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议，党在一九



五八年春天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发奋图强的伟大意志，又反过来起了动员人民群众的作用，调动了一切可能调动的力量，促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开辟了我国国民经济不断跃进的局面，并且在农村中展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民公社运动。

群众运动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正在愈来愈显著地发挥出来。由于几亿劳动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劳动积极性，并且展开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这就保证了我国经济能够持续地跃进。可以断言，我国的技术革命，会比过去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快许多倍。我们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在加强中央对经济建设的集中领导的同时，又注意发挥各级地方的积极性；在发展大型企业的同时，又注意发展中、小型企业；在发展“洋法”生产的同时，又注意发展“土法”生产。执行这些“同时并举”的方针，就把最广大的群众动员起来，把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充分有效地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在一九五八年大办钢铁的运动中，我们开展了大型企业和“洋法”生产的群众运动，又开展了中、小型企业和“土法”生产的群众运动，几千万人兴高采烈地卷入这个运动，表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冲天干劲，结果就造成了钢铁生产的巨大的跃进，而且造成了钢铁工业在全国合理分布的基础，为今后我国钢铁工业的高速度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同时，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我们及时地调整劳动中人和人的关系，及时地调整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中某些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因而使得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断趋于完善，更加促进了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高涨。显然，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依靠广泛的群众运动，才有可能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中，改变我国经济的落后面貌。

在我们的队伍中，也有看不见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因而怀疑群众运动的人。他们总以为，群众的觉悟不够，群众运动是靠不住的。但是事实上，我国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是很高的。并不是群众落后，而是这种怀疑群众的人自己落在群众的后面。当然，群众也需要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进行自我教育，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运动之所以能够对于推进社会主义事业起重大的作用，就因为，通过这种群众运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同时，这种群众运动又是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最好的学校。我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正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次又一次的群众运动，深刻地受到社会主义教育，而使自己的社会主义觉悟迅速地提高起来。

在我们的队伍中，也有人认为，在革命中固然需要群众运动，但是在建设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在革命和建设中，在政治斗争和经济事业中，群众运动



的形式当然应当有所不同；但是，我们的经济建设不能脱离政治工作，而必须以政治为灵魂，为统帅，那也是很明显的。要做好经济工作，就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来充分地利用客观经济规律。否认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的人，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绝对地对立起来，因此也就看不见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我们的建设事业中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他们又把在经济建设中依靠群众和依靠技术干部这两件事绝对地对立起来，而不知道群众的生产实践对于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意义。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在还缺乏足够多的技术干部，更要求有一批高度水平的、杰出的科学家、发明家和其他技术专家。但是，专家要发挥自己的才能和作用，必须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的实践中不断地吸取新的经验。认为在建设只要企业管理人员和少数专家发号施令，而把群众看成是消极的、被动的因素，不要群众运动，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人民群众的创造新生活的热情和他们的首创精神，是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无穷无尽的源泉。离开了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能力，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主义事业。列宁说得好：“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反对从书本上的现成公式出发来解决生活中的新鲜问题。我们要在一个人口众多而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中进行社会主义事业，不能不遭遇到许多特别的困难和许多复杂的问题；克服这些困难，解决这些问题，都必须依靠群众斗争的活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一贯地坚持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也就是要通过中国人民群众的实际斗争，来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亿万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行动起来的时候，不但使许多原来以为很难做到的事情迅速地完成了，而且冲破了各种过时的陈规，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为我们的事业找到各种适当的新的形式。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创立了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决不是偶然的。原来规模比较狭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跃进的要求，因而产生了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并且在全国农村中迅速地形成了人民公社化的热潮。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正确地领导了这个群众运动。由于人民公社是中国亿万群众的创造物，所以它才能这样迅速而普遍地发展起来，并且对于发展农村经济和文化、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起着巨大的作用。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合乎历史规律的群众运动，当然不可能是在少数人的命令之下一哄而起，也绝不会在少数人的反对之下一哄而散。人民公社具有异常强大的生命力，农民们说，它是“雷打不散”的。在我国条件下，人民公社是加速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强有力的武器，也是将来农村由集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



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社会組織形式。

在几亿人民参加的新的巨大的事业中，发生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缺点，在任何时候都是难免的。但是，我們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害怕这些缺点而否定群众运动。我們的群众运动是在党的集中领导下的群众运动，领导者和群众一起前进，和群众一起从实际經驗中学习，因此，有了缺点也是容易发现和克服的。我們党内的少数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看不见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伟大成就，竭力夸大群众运动中的某些已經克服了的缺点，借以非难党的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一九五八年的大办鋼鐵运动对于我国国民經济迅速发展的积极作用，在实际生活中愈来愈明显，而他們却以为这个运动只能起破坏的作用；人民公社已經在总结了初期的經驗以后进一步成长和健全起来，而他們却以为人民公社正在“倒退”，只有解散人民公社才是唯一的出路；广大人民群众都認为我国国民經济的跃进的局面好得很，而他們却認为“糟得很”。这种右傾机会主义的观点，显然不过是害怕群众和敌視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級反动观点在我們党内的一种反映。

同资产阶級政党相反，无产阶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敢于最高度地发揚人民群众的創造力量，永远站在群众运动前面，不断地为群众指出正确的方向，及时地向群众提出新的斗争任务，引导群众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我們的党正是这样做的。我們的党是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是一个群众性的党。我們的一切工作方針和政策，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通过广大的群众运动，我們的党和群众建立了血肉相关的密切联系。由于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胜利，由于国民經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胜利，更加强了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更加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在长期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人民大团结的核心。这个伟大的团结，就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和繼續取得胜利的根本条件。

中国人民同全世界人民的团结一致，是我們的革命和建設事业能够取得胜利的必要的国际条件。

无产阶級的革命事业从来就是国际性的。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級的斗争，都是全世界无产阶級共同斗争的一个部分。在我們的时代，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为了争取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崇高事业，形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性的共同斗争。全世界每个国家不論大小，每个民族不論先进或落后，在这个共同斗争中都有自己的地位。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人民，只要把自己动员起来，組織起来，团结起来，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就能够胜利地进行自己的斗争，从而，对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斗争作出贡献；同时，他們也都能够从这个共同斗争中得到援助和支持。

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級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組成部分，它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的繼續。中国革命的胜利，扩大了十月革命的伟大影响，对于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这样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这是对于帝国主义体系的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胜利了的新中国，参加了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极大地增强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优势。苏联、中国和其他兄弟国家所结成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一致和日益强大，根本改变了国际范围内阶级力量的对比。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彻底完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并且通过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正在迅速地改变着贫穷和落后的面貌，树立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到先进的工业国的一个榜样，这就不能不极大地鼓舞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前途的斗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个东方大国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且不断地取得伟大的成就，这就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限生命力，更加使得全世界一切要求进步的人们，愈来愈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吸引。

中国人民从全世界人民的伟大团结中，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我们在斗争中从来不是孤立的。中国人民在任何情况下，总是自力更生地、坚决地进行自己的斗争；同时，世界革命力量的援助和支持，对于我们斗争的胜利，也具有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在国际范围内，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①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苏联方面得到了巨大的、兄弟般的援助，得到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和一切进步力量的援助。中国人民衷心地感谢这种伟大的国际援助。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各国革命事业胜利的重要条件，是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重要武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反对各种各样的大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种表现。资产阶级从它的剥削阶级私利出发，或者用大国主义的旗帜把自己的民族摆在别的民族之上，以达到它压迫和剥削其他民族的目的；或者用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使自己的民族同世界人类进步的轨道相对立。无产阶级如果沾染了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潮，就会严重地损害革命事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总是利用民族感情来散布资产阶级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民族主义毒菌，作为他们破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挑拨世界各国民族团结的一种重要手段。以南斯拉夫统治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用民族的招牌来反对国际团结，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应声虫。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再告诉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永远团结在一起，必须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我们行动的准则。

伟大的苏联是中国人民最忠实的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苏联和中国这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结成了巩固的、亲密的同盟。中苏两国的团结一致，对于全世界人民的团结一致，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说，中苏两国的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直把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作为我们重要的国际主义责任。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可靠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了这个阵营，同这个阵营共命运、同呼吸。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里，我们社会主义各国的国民经济都在共同高涨，我们各国之间的友谊和团结也日益增强和巩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关系，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基础的，是相互尊重、相互鼓舞和相互援助的平等的兄弟关系，这是最真挚友爱的新型的国际关系。不断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以苏联共产党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一切更广泛的国际团结的核心。经过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九五七年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这个核心更加增强和巩固了。有了这样一个坚强的核心，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全世界的维护和平和要求进步的力量，就进一步紧密地团结起来，给全人类带来了无限的光明和希望。

苏联、中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团结，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破坏不了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愈是对我们的伟大团结进行恶毒的攻击和破坏，我们愈是要努力巩固和发展我们的团结。在我们的伟大团结的面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任何挣扎，都挽救不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和平力量必将战胜帝国主义战争势力，被压迫民族必将推翻殖民主义反动统治，社会主义制度必将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不可抵抗的历史规律。我们的时代，是人类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我们的事业一定会取得愈来愈大的胜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的胜利。

^① “离开莫斯科时在车站上的临别演说”，“新华月报”1950年3月号。



論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大跃进

李 富 春

如何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这是我們党在革命和建設中都要解决的問題。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証明了我們党在革命中已經創造性地解决了这个問題。那么，能不能說，我們在建設中已經解决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問題呢？

社会主义建設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問題是建設速度問題。我們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实现了在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在資本主义国家历史上也很少有过的发展速度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設能不能用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这是在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建設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这个基本原则方面，所要解决的最重要、最核心的問題。

当一九五五年冬季我国生产資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完成的时候，毛澤东同志就科学地預見到了国民經济更高速度发展的可能性，并且及时地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設的口号；随后又提出了实现这种客观可能的一系列綱領性的主张，其中包括十二年（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綱要草案和关于“十大关系”报告。根据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社会主义建設实践的經驗，根据毛澤东同志思想的发展，党的八大二次會議正式地制定了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和几个同时并举的一套方針。这样，我們就找到了一条适合于中国具体条件的用更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建設的道路。

有右傾机会主义思想的人，其中包括經驗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他們看不到全国人民要求迅速改变贫困和落后面貌的强烈願望和坚强意志，看不到已經从旧制度解放出来而建立了社会主义新制度的几亿劳动人民的伟大力量和丰富智慧，看不到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所建立起来的物質技术条件的作用。他們被旧的思想、旧的經驗所束縛，認為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的速度已經很快了，而且基数愈大，发展愈慢，第二个五年計劃的速度只能比第一个五年



计划更慢而不能更快。右倾机会主义者，甚至在反映六亿多人民意志的总路线已经被广大群众所掌握而正在发挥巨大力量的时候，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得到蓬勃发展的时候，仍然怀疑总路线，并且寻找机会同我们算账，向党的总路线进攻。

实践是判断真理的唯一标准。到底真理是在我们这方面，还是在他们那方面？到底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速度能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快，还是要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慢？去年以来，在总路线指导下出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已经肯定地、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事实证明，我们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已经基本解决了用更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二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使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速度，大大地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同时也超过了其中增长最快的年份的速度。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点九，其中，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产值，下同）的速度为百分之十八，农业总产值的速度为百分之四点五。而在一九五八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八，其中，工业总产值的速度为百分之六十六，农业总产值的速度为百分之二十五。拿增加的绝对数来说，工农业总产值在第一个五年总共增加了五百六十亿元，一九五八年一年就增加了六百亿元。^①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为五百五十亿元，建设完工和部分完工而投入生产的限额以上工业项目为五百三十七个，增加的灌溉面积为二亿一千八百多万亩。而一九五八年，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为二百六十七亿元，建设完工和部分完工而投入生产的限额以上工业项目为七百个，增加的灌溉面积为四亿八千万亩。

在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大跃进的同时，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现代化运输工具的货运总量增加了二亿二千万吨，为过去五年增加总和二亿四千万吨的百分之九十一；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加了七十四亿元，为过去五年增加总和一百九十七亿元的百分之三十七。在文化教育方面，单以高等学校来说，一九五八年一年招收了新生三十二万人，为过去五年招生总数五十六万人的百分之五十六。一九五八年的

^① 这里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增加的绝对数，是按一九五二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一九五八年增加的绝对数，是按一九五七年不变价格计算的。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和一九五八年重工业品降价较多，因此，一九五七年不变价格总的低于一九五二年的不变价格。如果按照相同的价格计算，一九五八年增加的绝对数还要大于六百亿元。



大跃进，不是个别部门、个别方面的大跃进，而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大跃进，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全面大跃进。

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的全面大跃进，同过去比较起来，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八，农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四点五，工业的增长速度为农业的四倍。在一九五八年，工业生产增长百分之六十六，农业生产增长百分之二十五，工业的增长速度为农业的二点六倍。由此可见，过去五年我国农业发展速度落后于工业发展速度的情况，开始有了显著改变。在工业迅速大发展的同时，生产力得到了大大解放的农业正在迅速地赶上来。

第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四，轻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二点八。在一九五八年，重工业生产增长了百分之一百零三，轻工业生产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四。一九五八年的增长速度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作比较，重工业为四倍，轻工业为二点七倍。一九五八年重工业生产增长得特别快，既能够为重工业各部门提供更多的生产资料，又能够为轻工业和农业提供更多的生产资料。这样，就不但保证了轻工业和农业在一九五八年的迅速发展，而且将保证它们在以后年份的迅速发展。在重工业和农业都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在轻工业所需要的机器和原料都能够日益增加的条件，轻工业将有可能继续得到迅速的发展，而同重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更相适应。这样的趋势，现在也已经看得愈来愈清楚了。

第三，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工业各个部门都有很大的发展。拿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说，比较快的，如钢为百分之三十一·七，机器制造工业的产值为百分之三十四·六；比较慢的，如煤炭为百分之十四·四，发电量为百分之二十一·六，原油为百分之二十七·三。一九五八年，在以钢为纲的带动下，重工业各部门有了更快的发展，在洋钢增长百分之四十九·五、机器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二百零四的同时，过去发展比较慢的煤炭增长了百分之一百零八，发电量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二，原油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五。过去比较薄弱的一些环节，有的已经开始消除，有的正在逐步改变。

第四，由于一九五八年重工业的大发展，特别是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大发展，钢材的自给率已经由第一个五年平均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上升为百分之八十以上，机器设备的自给率已经由第一个五年平均的百分之五十五左右上升为百分之八十左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新建和扩建的重要的大型企业，多数是由苏联帮助设计和供应成套设备的，是在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专家帮助下进行建设的。由于我国广大职工的努力学习，我们自己已经能够进行许多重大企业的设计。在这方面，我们在一九五八年有了更加显著的成就。

第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建设了一批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起骨干作用的



大型现代化企业，并且开始了华北、华中、西南、西北各地区新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九五八年，我们除了继续建设过去已经开工的将近五百个限额以上的厂矿以外，新开工建设的限额以上的厂矿有一千多个；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的中小城镇和乡村，我们举办了大量的小型工业单位，数目达到了几十万个。在一九五七年，连一吨钢也不能生产的，有内蒙、江西、浙江、福建、河南、广西、贵州、甘肃、宁夏、西藏等省区。但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之后，除了西藏以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能够生产钢了；这一年我们不但扩大了原有的十八个钢铁重点企业，而且新建了二十多个中型的钢铁厂和三百多个炼铁基点。就机械工业来说，一九五八年不但新建和扩建了二百二十个大型工厂，而且建设了数以万计的中小型企业。过去根本没有机械工业的专区、县和一些区乡，一九五八年都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办起了机械制造厂和修理厂；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现在都能够自己生产某些冶金设备、电动机、机床、动力机械和农业机械了。这种情况，表明一个以钢铁和机械为中心的、大中小型企业相结合的、地区分布比较合理的全国完整的工业体系，正在迅速形成。这样，也就同时为各协作区和许多省、自治区将来建立不同水平和各具特点的工业体系开始创造了条件。

第六，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实践的锻炼和大、专学校的培养，我们的技术干部队伍大为扩大了。一九五八年，由于党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提高共产主义风格的口号，在技术革新和某些技术革命方面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灿烂景象。一九五八年试制成功的工业新产品，相等于第一个五年的总和。在农业方面，各种农作物出现了高额丰产的典型，我们在集中和发展广大农民长期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

第七，在高级合作化的基础上，由于党的总路线的鼓舞，由于农村生产、建设事业的大发展，我国农村实现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化。这种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合一和农林牧副渔相结合的人民公社，在发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力利用率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农田水利建设，发展农村工业，进行农业的技术改革和农村的文化革命，发展公共福利事业等方面，表现了比高级农业合作社更巨大的优越性。

第八，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大发展，完全消灭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城市失业现象。城市新增的劳动力已经不能满足工业生产和建设发展的需要；农村在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虽然把很多妇女劳动力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农村的生产和建设，但是仍然感到劳动力不足。在我们这个六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开始出现劳动力不足的现象，这当然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大事，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好事。它表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的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同时它也向我们提出了加快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



任务。

第九，在工农业大跃进和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一九五八年的国民收入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三百二十三亿元，即增长百分之三十四。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总共才增加了三百二十二亿元，平均每年增加六十四亿四千万，速度为百分之八点九。国内外的反动派和他们的应声虫——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我们去年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大搞丰产田、大办工业基本建设都是“得不偿失”。可是我们一九五八年一年所增加的国民收入，比第一个五年总共增加的还要多。只是这个事实，不就把他们的谬论打得粉碎吗？

第十，由于国民收入的增加，一九五八年的积累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七，为第一个五年平均每年增长速度百分之十五的六倍多。积累的迅速增加，使基本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成为可能，从而为今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一九五八年基本建设投资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九十三，这是我国过去从来没有过的速度。由于这一年重工业生产增长了百分之一百零三，基本建设不但有资金的保证，而且有物资的保证。

在积累大增长的同时，一九五八年国民收入中的消费部分也比以往任何一年增加得快。在农民自给性消费较往年大为增加的情况下，一九五八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还比上一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六，其中农村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以上。城市建设包括职工宿舍和城市公用事业在内，规模也超过了以往的任何年份。在文化生活方面，这一年大约有二千万学龄儿童入学，有七百万学生升入了中等学校。同时，保健卫生事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帝国主义造谣说我们的大跃进是“牺牲”人民的福利换来的。事实粉碎了他们的谎言。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不是降低了人民的生活，而是迅速提高了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我们积累的大增长不是用降低消费的办法来取得的，而是在国民收入大大增加的基础上，在迅速提高人民消费水平的情况下实现的。一九五八年以来，生活消费品的生产尽管增长得很快，但是由于社会购买力增长得更快，某些副食品和极少数几种日用品暂时出现了供应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是毫不足怪的。这种现象不是表明人民生活水平的降低，而是恰恰相反，表明了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

所有上面这些特点，反映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已经出现了一个新局面，一个既是高速度发展、又是按比例发展的新局面。经过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基本的比例关系更加协调的情况下，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的比重由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五上升为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六十三点六，农业的比重由百分之四十三点五变为百分之三十六点四；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的比重由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四十八点四上升为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三，轻工业的比重由百分之五十一·六变为百分之四十二·七。这就说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已经在一九五八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

一九五八年的全面大跃进，当然不是偶然发生的现象，而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把我国六亿多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和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的结果。

一九五八年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所以能够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更快，是因为我们比过去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和有利因素。

第一，我们在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后，又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在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又取得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在去年大跃进中，我们又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如此等等，就彻底推翻了各种旧制度，打击了反映旧制度的各种旧思想、旧观念，这就使过去几千年沉睡着的社会生产力苏醒过来。

第二，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人是社会中最宝贵的财富。在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和产生这种制度的根源以后，六亿多人的威力就能够充分发挥出来。

第三，六亿多人民从旧制度下解放出来以后，迅速发展工农业生产，使我国拥有世界上任何国家所不能有的最广阔的国内市场。这个国内市场，给我们提供了经济飞跃发展的巨大可能性。

第四，我国是一个土地广阔和气候良好的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长期未被开发。在人民已经成为社会的主人以后，将逐步地成为自然的主人，就使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能够成为更快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大因素。

第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建立，就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更好的现代化的物质技术条件。

第六，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援助，是我们过去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苏联正在进行伟大的七年计划建设，其他兄弟国家的经济正在共同高涨，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也在日益丰富，这就有可能使我们继续得到国际援助，更好地学习兄弟国家的建设经验。

一切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人，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全面胜利以后，虽然也肤浅地、模糊地看到一些有利条件，但是他们把中国人口多，农民多，看成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当作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高速度发展的一个根据。同这些人的悲观论调恰恰相反，毛泽东同志以最高度的战斗热情、最革命的乐观态度告诉我们：“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



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他向我们指出，五亿多农民不但在革命中、而且在建设中，同样是一支最伟大的力量。问题的关键在于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要采取正确的政策和适当的形式，把包括五亿多农民在内的我国六亿多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就是毛泽东同志紧紧地掌握了上述的特点，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真理而提出来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要实行政治挂帅，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人们的主动性；多快好省，是要求在生产 and 建设中，尽可能地提高发展速度，充分发挥经济效果，不断地增强物质技术基础。也就是说，要把政治和经济统一起来。

下面我们就党的总路线的几个基本点分别地做些说明。

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这是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点。在这个基本点里面，包含着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的内容。由于重工业生产主要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农业和轻工业的生产主要是消费资料的生产，所以上述方针，反映了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条件下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的客观规律的要求，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的結合。这个方针，使我们避免了只重视工业而忽视农业、只重视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的片面性。因而我们既能调动几千万职工的积极性，又能调动五亿多农民的积极性；既能调动重工业部门职工的积极性，又能调动轻工业部门职工的积极性。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我们打破了城市只发展工业、农村只发展农业的老观念，一方面，城市在集中主要力量办工业的时候，也在周围地区积极发展为城市服务的农业；另一方面，农村在集中主要力量办农业的时候，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发展为农业服务的工业。值得着重指出的是，我们已经找到了在农村实行工农业并举的人民公社这种最好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样，不论在城市或者在农村，出现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同时跃进，就不是什么偶然的現象。

在以现代化大型企业为纲的条件下，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这是总路线的另一个重要的基本点。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实现工业的现代化，用现代技术来装备农业和其他所有的经济部门，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看，落后的国家赶上先进的国家，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采用先进技术，迎头赶上。社会主义国家要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更有必要和更有可能采用这个方法。我们要改变技术落后的面貌，必须建设一批现代化的大型骨干企业，力求采取一切先进技术，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方针。但是，建设这样一类的企业，



需要資金多，建設時間長，技術不容易一下子掌握，設備供應有一定限制，如果我們仅仅限于舉辦這類企業，就不能完全適應社會的需要，就不能充分施展我們的各種力量，並且會延緩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大中小企業同時並舉、洋法生產和土法生產同時並舉的方針，使我們避免了只注意大型企業而不注意中小企業、只注意洋法生產而不注意土法生產的片面性。因而既調動了技術水平比較高的職工的積極性，也調動了技術水平比較低的職工的積極性；既鼓舞了會辦工業的人更好地辦工業，也鼓舞了原來不會辦工業的人敢於辦工業。值得着重指出的是，在全國二萬四千多個人民公社中，已經辦起了幾十萬個小型工業單位。儘管它們的規模小，技術水平低，但確實是我國廣大農村改變貧困和落后面貌的重要起點。這種社辦工業有許多突出的優點：一、它是辦在农村的，是直接為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服務的，農民親眼看到它的好處，而且所需要的資金比較少，這就便於調動農民為辦工業而積累資金的積極性；二、便於利用當地比較分散的礦產資源和農產資源，並且使生產更好地適合當地農民的具體需要；三、利於農村的技术改造，利於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四、可以充分利用大中型企業更換下來的舊設備，而提高這類設備的使用年限，節約社會資金；五、利於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提供技術後備力量。有些人因為這些企業在初創時期的產品質量比較低，成本比較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得比較慢，而看不起它們。這些人只是把公社初期舉辦的工業同現代化大企業作比較，而不同目前廣大農村落后的農業技術作比較。他們的錯誤，就在於不懂得調動五億多農民的積極性，不懂得社辦工業是調動這個偉大力量來參加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的最適當的形式；也不懂得任何事物發展的過程都是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的過程。他們藐視新生的事物。但是，新生的事物是最有生命力的，是最有偉大前途的。在一九五八年，正是由於我們執行了大中小企業相結合的全民辦工業的方針，在全國範圍內就出現了“小土群”和“小洋群”的工礦企業星羅棋布、遍地開花的壯麗情景，這不是很有力的證明嗎？

在集中領導、全面規劃、分工協作的條件下，實行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這是總路綫又一個重要的基本點。不只是工業，而且是其他經濟事業和文化教育事業，都要實行中央和地方分級管理的原則。在我們這樣廣大的國家里進行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並且要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里建成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沒有中央的集中領導，全面規劃，當然是不行的；同樣，如果只有中央的集權，而沒有適當的地方分權，當然也是不行的。中央要注意發揮省、市、自治區的積極性，省、市、自治區要注意發揮專區、縣的積極性，專區、縣要注意發揮公社和企業的積極性，公社也要注意發揮生產隊、生產小隊的積極性，企業也要注意發揮車間、班組的積極性。實行這樣的方針，在領導工作上，就有更多的人出主意，想辦法，分擔責任。這樣，就能夠使中央集中力



量管理最重要的、有关全局的事情，使各级地方根据当地的特殊情况和特殊条件，因地制宜地举办当地可能办和必需办的事情，从而提高工作效率，避免官僚主义和各种片面性。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够得到普遍而迅速的发展，全国各地方的经济和文化才能够得到共同的高涨。

所有这些基本点，以及以纲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集中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以政治为统帅、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把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和物质鼓励结合起来、把领导生产和安排生活结合起来的方针，等等，就使我们能够把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和各个岗位上的广大人民群众都动员起来，把一切积极因素、一切可用力量都调动起来，并且能够把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冲天干劲经常地保持下去。



四

有人承认一九五八年全面大跃进的出现有它的必然性，但是他们认为这种大跃进只是暂时的，是不能持久的。我们的看法同他们相反，认为它不是暂时的，而是能够持久的。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一个跃进阶段的开端。这是因为：反映客观经济规律和六亿多人民要求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长期起作用的，它将愈来愈发挥更大的威力；前面所说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可能更高速度发展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有利因素，也将愈来愈显示出重要作用。一九五八年的全面大跃进，不是象右倾机会主义者所说的为今后的跃进造成了困难，相反地，却为今后的继续大跃进准备了更好的物质条件，积累了许多的经验。

事实就是如此。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在一九五八年全面大跃进的基础上，取得了继续大跃进的新胜利。拿今年一月到八月累计的数字同去年同期比较，工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五，其中：钢产量增长百分之六十六点六，煤产量增长百分之七十八点五，发电量增长百分之五十一，机床产量增长百分之四十九，棉纱产量增长百分之三十一一点七。其他重工业产品和轻工业产品的生产，也都有很大的增长。农业生产虽然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夏收作物仍比特大丰收的去年增产二十五亿斤。铁路货运量增长百分之四十六点八。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百分之十八。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发出反右倾、鼓干劲的指示以后，国民经济各个战线上出现了更加蓬勃发展的增产节约的新高潮。单就钢的平均日产量来说，八月下旬是三万三千吨，中旬是三万七千吨，下旬是三万八千吨，九月上旬是四万一千吨，九月中旬就达到四万五千吨，九月中旬比八月上旬增长百分之三十六。人们从这个事实和其他各方面的事实中满怀信心地看到，我们将能够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指标，从而在今年提前完成原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这样，我们也就能够赢得三年



的时间，在更大的规模上，用更高的速度，来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設。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連續两年的大跃进，用事实证明了：我們完全有可能在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巨大发展的基础上，取得更高的发展速度；也证明了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只能等于、以至会低于第一个五年的速度的看法，是不对的。当然，基数扩大以后，对于速度的繼續提高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但是，就我国目前时期的情况来说，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开发自然资源、进行技术革命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不可估量的雄厚的潜在力量。而且，工农业生产愈发展，物质技术基础愈扩大，这种潜在力量也就会愈大。只要我們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和它的几个同时并举的方针，我們的工农业生产就能够在长时期内，保持跃进的速度，这是确定无疑的。

我們說，我国国民经济将会持续地跃进发展，并不是說每年的发展速度都是一样的。由于我国国民经济中占相当大比重的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还很大，有时年成好，有时年成坏；由于新增加的生产能力也不可能每年都一样，有的年份多一些，有的年份少一些；而且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还可能出现其他一些难于完全预料的因素，等等。这样，国民经济的发展，必然是波浪式地向前迈进的，速度有时高一点，有时低一点，这是正常的现象。但是，总的說来，我們的经济是逐年增长的，我們的建設是高速发展的。我們完全有可能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內，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大跃进对于我們来说是一个新事物，我們的經驗当然还不够。为着保证国民经济持续不断地跃进，一方面必須及时克服各种右倾情绪和右倾思想，必須向右倾机会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必須經常积累經驗，总结經驗，随时注意各种比例关系，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使我們的经济计划真正地体现党的总路线的要求。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決議指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是我国勤劳勇敢的六亿五千万人民的伟大决心和伟大智慧的表现，是我們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澤东同志創造性地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結合起来的产物。”毛澤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解决了革命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的問題，使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毛澤东同志及时地总结了建設的經驗，作出了巨大的理論贡献，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使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取得了不断的胜利。无数的事实证明了，毛澤东思想是我們无往而不胜的思想。因此，我們必須認真地学习毛澤东同志的著作，認真地、随时地按照毛澤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理，来进行工作，解决問題。只要我們很好地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澤东思想，我們就能够在总路线的光輝照耀下，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不断的大跃进。



不断发展我国各民族的大团结

烏 兰 夫

我国各民族人民，以无比欢欣的心情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十年来，我们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经历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我国巩固地树立起来。各民族地区的社会面貌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在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胜利。我们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已经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磐石一般地巩固起来了。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由许多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人民之间发展了经济上的联系和文化上的交流，很早就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但是过去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制度下，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帝国主义的侵入，加深了我国国内各民族人民的苦难。这样就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近一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各民族人民共同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长期的共同的革命斗争，把我国各民族人民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不可分离的血肉关系。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我国反动统治，彻底地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实现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根本改变了我国的民族关系，使我国进入了一个各民族友爱合作、共同发展的新时代。

十年来，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执行了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充分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现在，我国已经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以及二十九个自治州、五十四个自治县。在全国建立自治地方和自治机关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各少数民族在自治地方都根据宪法规定，充分享有当家作主的自治权利。一切杂居的和散居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也都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各民族在祖国的大家庭内，都以平等的地位，参加了国家事务的管理和决定，都是国家的主人翁。



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实施，迅速地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合作，大大地提高了各民族人民的爱国观念，进一步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充分发挥了各少数民族人民共同参加祖国建设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促进了各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我国各少数民族中，大约有近三千万人口的地区还保持着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度，大约有四百多万人口的地区还保持着封建农奴制度，大约有一百万人口的地区还保持着奴隶制度，此外，还有约六十万人口的地区保持着浓厚的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一般都落后于汉族地区。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甚至仍沿用着“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或者过着游牧、狩猎的生活，生产水平十分低下。许多少数民族还没有文字，其中有些民族仍然用刻木、结绳的古老方法记事。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少数民族人民进行了社会改革。现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少数民族人口的地区都先后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且进行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批判了各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取得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在一九五八年又和汉族地区一起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胜利；在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加入人民公社的农户已占这些民族地区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广大的少数民族人民已经从封建制度、奴隶制度以至原始公社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超越了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直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运动，也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可以预料，西藏人民在完成民主改革之后，也一定会经过必要的发展过程，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公社化的大道。

十年来，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在经济上的实际不平等，正在逐步得到改变。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面貌更有了飞跃的变化。全国少数民族地区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相当于一九四九年解放时的二倍多。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八十四，相当于一九四九年的五倍多。少数民族牧业区的牲畜头数，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一倍多。少数民族人民的购买力已大大提高，一九五八年少数民族地区商业销售总额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四倍多。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一九五八年，全国少数民族的大、中、小学生共计四百六十五万人。同解放前比较，大学生增加了三十五倍，中学生增加了一百一十倍，小学生增加了八倍多。有些过去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现在已经创造了文字，并且有了用本民族文字出版的图书、报纸和杂志。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文化正在蓬勃地发展起来。在卫生事业方面，一九五八年少数民族地区已有了七百五十座医院，二十五所疗养院，三万四千多张病床，十七万多卫生技术人员



员, 医疗、保健、妇婴卫生机构已经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地建立起来, 有些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 已经基本上得到控制。由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卫生医疗工作的开展, 许多少数民族的人口都在迅速增加。例如, 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人口从自治区成立的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八年, 增加了三十多万人, 相当于该区原有蒙古族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六; 新疆的少数民族人口, 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五十八万多人, 相当于原有人口的百分之十三多。

少数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迅速发展, 是同国家的大力帮助和汉族人民的大力支援分不开的。解放后几年来, 国家每年都给少数民族地区以巨额的财政补助, 发放各种贷款、救济款, 设置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补助费、卫生医疗补助费等, 并且在许多民族自治地方直接投资进行重点建设, 帮助各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文化的建设事业。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八年的七年中, 国家对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共达三十四亿一千多万元。同时, 国家还有计划地从内地动员青壮年, 前往迫切需要劳动力支援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驻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解放军, 也积极帮助当地人民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或其他经济、文化战线上都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国家在干部、技术人材等方面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帮助, 那就更不用说了。毫无疑问, 今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继续跃进和人民公社优越性的充分发挥, 我们国家和汉族人民对少数民族的帮助, 将会越来越多。这种帮助, 对于各少数民族的迅速发展和繁荣, 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对于这种帮助都充满了感激的心情。当然,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 少数民族也积极地支援了国家的建设和帮助了汉族人民, 这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胜利, 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已经在我国各民族间普遍地形成和发展起来。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实现, 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和政治基础。民主改革完成以后, 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 为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奠定了巩固的经济基础。全民整风运动的胜利, 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实现,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种关系的主要特点是: 各民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 平等互助, 大团结, 大协作, 共同劳动, 共同发展。

一九五八年以来, 我国各民族人民, 在兴修水利、大炼钢铁以及其他一切为争取工、农业生产高速度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群众运动中, 打破民族界限和地区界限, 实行大团结、大协作, 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和热情之高, 都是史无前例的。甘肃省的引洮工程, 就是我国各民族人民在大跃进中实行大团结、大协作的许多突出事例之一。引洮工程建设在海拔一千多公尺到两千多公尺的高山之上, 全长一千四百公里, 流经汉族和回族以及其他民



族聚居和杂居的二十多个县、市，相当于世界著名的苏伊士运河的八点五倍，巴拿马运河的十七倍多。全部完工以后，可以使一千五百万亩到二千万亩的旱地变为水田，可以植树造林一千多万亩，促进水土保持五万平方公里，扩大草原一千五百多万亩。同时还可以利用渠道的落差建立一百多个中、小型水电站。在水上交通方面，二十吨到一百吨的船只可以在海拔一、二千公尺以上的山梁水道上通行无阻。这样大的工程，从一九五八年开工，在甘肃省的汉、回、藏族以及其他各民族人民的同心协力之下，第一期从岷县的古城到隴西县大营梁六百公里的工程，在今年内就可以大体完成。当地汉、回、藏等各民族人民在这一工程中表现了无比的英雄气概。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全省各族人民就集资一千二百多万元，并且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前往支援。各民族人民互相支援的例子，在全国是很多的。如在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旗民族团结公社在一九五八年听说汉族地区的红星公社遭了大水灾，生活困难，就无偿地送给他们土豆、白菜各万斤，饲草十万斤。当五原、布特哈等农业区的旗、县缺乏燃料时，牧区的乌拉特中后联合旗、陈巴尔虎旗就收集了十多亿斤燃料去支援他们。又如广西僮族自治区的隆林各族自治县，在去年大炼钢铁的运动中，组织了六万多人的一支僮、苗、瑶族远征军，远行十多天，行程数百里，支援了百色和田林县。各民族人民都以积极参加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支援别人为无上光荣。互相支援和协作的范围，由工业、农业到交通运输业，由劳动力、技术人员到生产资料和建设资金，由乡、社之间到县与县、州与州之间以至各省（市）、区之间。互相协作和支援的规模，由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一直到几十万人。国家在内蒙古建设的包头钢铁联合企业和在新疆建设的克拉玛依石油工业基地等巨大的现代化工业，都是在全国各地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之下兴建的。

为了取得大跃进的胜利，我国各民族人民在一九五八年以来，还展开了广泛的学先进、赶先进的活动，互相参观访问，互相交流生产技术和建设经验，开展友谊的竞赛，这对于变落后为先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例如，广西僮族自治区的三江侗族自治县，原来是个比较落后的地方，长期缺粮，但是在一九五八年内该县的农业生产却一跃而名列自治区的前茅，成为全区粮食增产的一面红旗。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学习和推广了外地的和本地的先进增产经验。总计从一九五七年冬到一九五八年底，该县组织的到外地和在本县的参观访问，先后一百多次。而三江的增产经验，又为全国许多民族地区所重视，前来参观访问者络绎不绝。一九五八年秋季还在这里召开了全国民族工作现场观摩会议，推广了他们的先进经验。

人民公社是发展我国各民族经济、文化和加强民族团结的最好形式。人民公社在更大的范围内，把各个不同的民族成员组织起来，在一个人民公社内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互相学习和共同进步。它最便利于彻底清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偏见，不断增强各民族成员之间的兄弟信任和同志合作；也最便利于各民族成员之间互相学习语言文字，互相吸收先



进經驗和优良文化成果，从而也最有利于我国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进步。

人民公社是一种規模宏大的、多种經濟的、工农商学兵相結合的、政社合一的嶄新的社会組織形式。它可以最有成效地充分动员和合理安排农村中各民族的劳动力，充分发挥各民族的生产特长，实现各民族之間的互相协作，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所难以兴办的各种建設，使各种經濟得到迅速的发展，使各民族人民的生活迅速地得到改善。

人民公社具有比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多的和增长得更快的公共积累，可以更有計劃地和更加合理地来安排社內各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有了人民公社，就更便于帮助那些在生产上还比較落后和生活上还比較困难的民族，使他們能够和走在前面的民族一起得到共同的发展，逐步地但是迅速地消除历史上遺留下来的各民族人民之間在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上的实际不平等，使各民族人民都能过幸福美滿的社会主义生活。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不断发展中，我国各民族之間的接触愈来愈多，联系愈来愈密切，彼此之間的互相学习和互相影响也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不只是表现在各民族成員在同一人民公社、工厂、机关、学校內部的共同劳动、互相学习上，而且还表现在各民族地区之間联系的空前加强上。十年来，我們在各少数民族地区修筑了近十万公里的公路、几千公里的铁路，并且开辟了十七条航空綫路。这些公路、铁路、航空綫路和汉族地区的交通綫路联結起来，就大大地縮短了各民族地区之間的距离，加强了中央和边疆的联系，为各民族地区之間經濟和文化的交流以及人們相互之間的接触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同时，国营商业机构网已經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地建立起来，深入到偏僻的乡村、山区和牧区，为各民族人民服务，通过物资交流，更把我国各民族地区从經濟上联結成为一个整体。

过去我国各民族之間，在社会經濟結構和政治制度方面，在經濟和文化的发展水平方面所存在的差异，經過十年的大变革，有的已經根本改变，有的正在迅速改变。在社会經濟的所有制方面，汉族和絕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地区都建立起了共同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經濟、文化的发展水平方面，少数民族地区落后于汉族地区的状况有了显著的改变。所有这些，就使我国各民族在共同发展和繁荣的过程中，共同性越来越多。毫无疑问，随着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在我国民族关系中的这种进步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对于民族关系中的这种进步趋势，我們必須采取热烈欢迎和积极贊助的态度。

伟大的列宁曾經說过：“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一要消灭人类分为許多小国家的現象和各民族間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一要使各民族互相亲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为一体。”^①他并且說：“无产阶級不能贊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地，它贊同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別、打破民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第140頁。



族壁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融合的东西。”^①

当然，我国现在还处在各民族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历史时期，距离各民族的融合还很远。各民族的融合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只有在各民族高度发展和繁荣的基础上，只有在实现了共产主义之后，才能逐步地达到各民族的融合。列宁曾经说过，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② 在目前我国各民族之间不仅存在着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心理素质等方面的差别，而且在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方面也还很不平衡，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我们在一切工作中，还必须认真照顾各民族的发展特点，为消除各民族之间的事实上不平等而努力。各民族具有自己特点的文化，在社会主义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还要有一个发展繁荣的时期。也只有各民族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繁荣的基础上，才能共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现在，摆在全国各民族人民面前的光荣任务，就是要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根据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争取在今后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实现了这个任务，就能够根本上改变我国各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落后面貌，达到我国各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共同繁荣。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我们必须继续不断地巩固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毛泽东同志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③

在我国六亿五千万人口中，汉族人口约占百分之九十四，并且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走在各少数民族的前面。汉族在我国各民族中起着先进的主导的作用，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主力军，负有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光荣责任。少数民族的人口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左右，但是总数也有三、四千万人，并且分布的地区广大，约占我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内，各种资源非常丰富，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有着重重要的地位，对汉族人民的发展也有着很大的帮助。因此，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国各民族人民必须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不断地巩固和发展以汉族为中心的大团结，使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向前跃进。

为了进一步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为了实现我国各民族地区社会主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1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2卷，第141页。

③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1页。





沙更世 作

义建设事业的更大跃进，必须继续向各民族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反对各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特别是应当向各民族干部进行无产阶级民族观的教育，使他們自觉地克服各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其残余。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一种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它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这种思想的存在，不利于我们伟大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间的团结合作，不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我国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对各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在我国各民族中已经深入人心，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思想在社会上已经搞臭。但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我国还没有绝灭，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是地方民族主义的残余，今后还会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特别是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有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政治思想斗争，才能够彻底地将它克服下去。

必须看到，剥削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一小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如西藏)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进行。帝国主义还在对我国各民族进行挑拨离间。即使在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度完全消灭之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还会在人们的头脑中保持一个很长的时期。这种影响在民族问题方面，要比在其他方面表现得更加顽固，因为它可以在民族外衣下很巧妙地伪装起来。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其残余，作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搞好我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



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①我们今后在实际工作中，必须继续贯彻执行这个指示。一方面要继续警惕和克服大汉族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也绝不能对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有任何疏忽。不管它是什么民族主义的倾向，都必须坚决地加以批判和克服。

帝国主义和国内外一切反动派，是不甘心他们在中国的失败的。他们仍然在千方百计地阴谋破坏我们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企图达到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和重新奴役我国各民族人民的罪恶目的。当然，他们的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中国各民族人民已经紧密地团结和高度地觉悟起来了。任何帝国主义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阴谋诡计，都会在我国各民族人民团结的力量面前碰得粉碎。今年三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策动下所发动的反革命叛乱的迅速失败，就是最好的证明。可是，我们仍然必须警惕来自帝国主义和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方面的对我国民族关系的挑拨和破坏，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为了进一步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发展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应当照顾各民族的特点，正确处理在人民内部发生的各种民族问题。在一切包括有不同民族成员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和人民公社中，都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和共同进步的原则。在多民族的人民公社内，应当注意在社务委员会和社员代表大会中，使各民族都有适当数量的委员和代表名额，并且应当注意培养和提拔各民族干部。对各民族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的特点，应该适当照顾，充分发挥各民族成员的特长。对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必须互相尊重；并且应当互相学习语言文字，经常交流各种生产建设经验。只有如此，才能有利于各民族人民的互助合作和共同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各民族人民的核心领导力量。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我们一切工作中取得伟大成就的最根本的保证，是我国各族人民的最大幸福。各民族人民对党和毛泽东同志充满了无限的热爱。过去我国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胜利。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号召我们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为实现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为提前三年即在今年内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奋斗。让我们各民族人民遵循这个伟大的号召，更进一步地团结起来，为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跃进而英勇前进！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23页。



共产党员应当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 不应当是党的同路人

康 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年，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澤东同志的领导下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伟大胜利的十年，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取得伟大胜利的十年。

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都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战胜资产階級思想的条件下取得的。在全国人民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前夕，全党响应八届八中全会的号召，展开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和坚持总路綫的斗争。我們現在已經在这一場斗争中取得了极大的胜利。我国广大的劳动群众掀起了一个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社会主义建設的新高潮，有力地回答和駁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总路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各种进攻和誣蔑。这一場斗争是我国十年来资产階級和无产階級的尖銳斗争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繼續。这一場斗争的胜利是我們在思想战綫、政治战綫上又一次极其重大的胜利，也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对于资产階級思想又一次极其重大的胜利。

毛澤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指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階級革命家，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階級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階級、小资产階級的民主派；他們从来不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在无产階級领导的每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当中，总会有各式各样的同路人来参加的。列宁說：“在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中，无论那一个比較大的派別，实际上在资产階級革命时期都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吸收一些各种色彩的‘同路人’。这种现象甚至在彻底完成了资产階級革命的最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階級經常同小资产階級的各式各样的阶层接触，經常不断地从这些阶层中吸取力量。”^①他說：“在资产階級民主革命过程中，許多人加入我們的党，并不純粹是由于拥护我們党的无产

^① “列宁全集”第15卷，第423—424頁。



階級綱領，而主要是因为看到我們党为爭取民主而进行了光輝的坚决的斗争，他們在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口号时，并没有把这些口号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整个斗争联系起来。”^①

在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开始不久的时候，毛澤东同志指出：“有許多党员，在組織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② 他們是跑到党里来的非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并不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澤东同志的这一分析，对于教育全体党员干部，提高他們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起了极大的作用。现在，毛澤东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即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設蓬勃高涨的条件下，指出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实质，这对于提高全党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同样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我們党的历史无可辯駁地証明：我們的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我們的党在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一贯地用坚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方針指导中国革命。我們的党是一个群众性的党，在广大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我們的党是在有着极为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国家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我們的党在过去长时期内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因此，有不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大批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找出路，甚至参加到无产阶级先锋队里来。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无产阶级负有改造他們的历史任务，并且可以把他們当中的許多人改造过来。党在“关于若干历史問題的決議”中着重指出：“任何沒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質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③ 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对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用自己的本来面貌来改造党的企图，必須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必須采用各种办法，使他們接受群众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使他們逐漸在思想上无产阶级化。我們党的历次整风运动，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效果。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参加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之后，有很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中接受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逐步抛弃了资产阶级的立場和世界观，逐步建立起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立場和世界观。这样，他們就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变成了无产阶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总还有少数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而不願改造自己的人，他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始終沒有多大变化，有的甚至是原封不动。他們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由于有着程度不同的民主革命的积极性，

① “列宁全集”第15卷，第413頁。

② “毛澤东选集”第3卷，1953年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876頁。

③ 同上書，第993頁。



还可以部分地同意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最低的斗争綱領，因而也可以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为革命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他們和党从来就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党坚持无产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权，坚持要把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以便在彻底完成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立即不停頓地轉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軌道上去；他們却主张把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交給资产阶级，而且沒有把这一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更沒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他們当中有些人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某些紧急关头，就脱离了党，甚至变成了革命的敌人，如陈独秀、张国燾等；有些人虽然留在党内，但是他們同党的领导，同党的正确路綫，时常发生抵触。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当千百万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真要結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时候，他們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間的矛盾就愈来愈尖銳，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社会主义的面貌就暴露出来了。

革命的历史是最无情的見証人，人們都不能不在它的面前受到考驗并显出自己的真实面目。斯大林說：“轉折是一种严重的事情。轉折对于那些在党的車子上坐得不穩的人是很危险的。”^①我們党内的同路人，到了革命的火車头轉到新阶段的时候，有些人墮落成为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是一件十分合乎邏輯的事情，决不是什么不合乎邏輯的事情。

当前我們党同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之間的政治分歧，集中表現在坚持或者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問題上。党坚持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这条总路綫。党对于广大群众所掀起的轟轟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設热潮，抱着无限的热情和希望，并且坚决站在群众的行列当中，领导他們奔向伟大的目标；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对于伟大的群众运动心惊胆战，总以为它会出“乱子”，总是站在一旁指手画脚，在群众头上泼冷水。党認為不論在任何时候，不論在革命或者建設的时候，都需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加强党和革命队伍的紀律，加强党的团结和人民的团结；右傾机会主义分子認為无产阶级既然取得了政权，革命就算成功了，党的领导作用就可以削弱了；他們为了要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不惜破坏党和革命队伍的紀律和团结，制造分裂，企图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极严重的損害。

当前我們和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矛盾，一般地說，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們站在资产阶级立場，反对党的总路綫，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党的领导，这是他們反动性的一面；另一面，他們有爱国心，还反对帝国主义，也还有一种模模糊糊要社会主义的傾向，这是他們革命性的一面。因为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具有这种两面性，所以党对他們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18頁。



理从寬”的方針，對他們的反社會主義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而只要他們決心改正錯誤，黨對他們的每一進步都表示歡迎。

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① 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政治路線的鬥爭，實質就是這兩個階級的世界觀的鬥爭。黨和同路人之間的政治分歧，歸根到底，是建立在世界觀的分歧的基礎上的。

無產階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我們黨一貫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一貫反對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正是這樣嚴格根據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來確定黨的基本任務和方針政策的。我們的黨在研究我國革命和建設中的問題以及決定政策的時候，不是靜止地看，而是在運動中看；不只看到過去，還要看到將來；不是按照緩慢變化的進化論的庸俗觀點，而是按照事物的辯證的發展規律。

可是，黨內的一些同路人，正象列寧所說的：“只能領會馬克思主義的某幾方面，只能領會新世界觀的個別部分或個別口號和要求，而不能堅決拋棄一般資產階級世界觀，特別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世界觀的一切傳統思想。”^② 也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他們看待問題總是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現在他們就是這樣囁嚅咕咕，非難黨的總路線，非難大躍進，非難人民公社。他們不是根據客觀分析得出合乎社會發展規律的結論，而是根據他們的主觀意願來判斷事物。在他們看來，一切事物凡是合乎他們主觀意願的，他們就贊成；凡是不合乎他們主觀意願的，他們就反對。他們的主觀意願，其實是資產階級的意願。這種反動的主觀唯心主義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就是那些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墮入反社會主義泥坑的思想根源。

主觀唯心主義發展到極端，就是唯我主義。有些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受到黨的批判之後，把自己的錯誤思想說成是“經驗主義”的。其實，他們的“經驗主義”，就是一種資產階級的主觀唯心主義。這種“經驗主義”發展到極端，也就是唯我主義。他們長期和黨鬧對立，有的人並且發展成為個人野心家，也正是和他們這種唯我主義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分不開的。他們否認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狂妄地把自己看成救世主。“國際歌”里說，世界上從來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是神仙和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這些有名的歌詞，他們雖然也唱過，可是却忘記得乾乾淨淨。

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主觀唯心主義世界觀和我們黨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鬥爭，是當前我國過渡時期階級鬥爭的一種反映。

①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第27頁。

② “列寧全集”第16卷，第347頁。



人们对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解，是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逐步深入的。这一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清楚地证明，过渡时期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确实是长期的、曲折的和复杂的。这种斗争是长期的，不仅因为旧的经济制度的改造还没有彻底完成，而且因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以及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消灭，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彻底克服。有些人以为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就“熄灭”了。一九五七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今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打破了这种天真的想法。这种斗争是曲折的，是有起有伏、波浪式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也还是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阵，再低一阵，有时尖锐，有时比较缓和，一直到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影响完全消灭的时候，这种斗争才会停止。这种斗争是复杂的，有敌我矛盾的问题，又有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有些人对于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的规律认识不足，存在着麻痹思想。他们对于这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感到意外。但是也有些人，由于对党的力量和群众的觉悟估计不足，因而对党能够迅速克服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估计不足。事实已经证明，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党是久经锻炼和考验的、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拥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我们的党有以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我们的党有大量的思想成熟的领导干部，我们全党都紧紧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周围，我们的战斗是无往而不胜的。我们的党从来是在不断同各种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在克服了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影响之后，我们党和革命队伍就会更加坚强，我们党和革命队伍的团结会更加巩固。

从这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当进一步认识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进一步认清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区别，认清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区别，坚决参加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决心做一个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做党的同路人。让我们高举总路线的旗帜，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奋勇前进！



中国人民胜利的国际意义

王稼祥

中国人民的胜利，不仅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而且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这个胜利，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取得的，因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迅速地完成了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因而中国人民的胜利，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正在飞速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地改变着中国的面貌，因而中国人民的胜利，又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

中国革命的胜利，发生在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亚洲大国，发生在许多帝国主义争相掠夺的一个半殖民地，发生在美国帝国主义霸占世界的战略计划的一个重点地区，因此，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也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伟大胜利。

帝国主义曾经是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最大的山。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愚公移山”的精神，长期地、坚定地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终于达到了打倒帝国主义统治的目的，并且彻底摧毁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控制权，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势力，坚决镇压了帝国主义的间谍、特务和其他一切爪牙，清除了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一切思想毒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年来，中国人民为了保卫祖国，又不断地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行了严重的斗争。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同朝鲜人民一起，在军事技术悬殊的条件下，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给了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中国人民清楚地认识到，对于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必须斗争到底，才能保卫和巩固自己的胜利。

中国人民的胜利，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那些正在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民族中，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是非常自然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今天的处境，同旧中国的处境是近似的。他们面临着的首要任务，也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统治和掠夺的革命斗争。各个被压迫民族，在中国人民胜利的事实面前，一定会想到：既然中国人民可以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开始斗争，把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打倒，彻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取得真正的、完全的民族独立，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进行到底，那么，在别的国家中，为什么不可以办到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汹涌澎湃的民族解放运动面前，帝国主义殖民势力在某些国家不得不作某些退让，以



求繼續保存帝国主义的势力。因此，他們对待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除了血腥的武装镇压之外，还采取欺騙分化、怀柔讓步的方法，直到承認某些国家的独立，讓资产阶级独占民族解放运动的果实，以阻止在这些国家里出現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局面。无数的历史事实証明，真正的民族独立决不是帝国主义恩賜的，也决不能依靠向帝国主义乞求而取得。爭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如果为希望恩賜和依靠乞求的思想所支配，不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就不能彻底完成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即使取得了一定程度上或者表面上的独立，也仍然不能使自己的民族完全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縛。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領導下的彻底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团結了全国一切爱国的人民，同帝国主义实行了彻底的决裂，不怕帝国主义的任何威胁和恫吓，不受帝国主义的任何欺騙和利誘，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是一条取得真正的、完全的民族独立的道路。

帝国主义在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彻底埋葬的日子，快要来到了。少数几个帝国主义大国占据地球上大片土地、統治和剝削人类大多数的时代，帝国主义为所欲为地把被压迫民族的反抗镇压下去的时代，已經一去不复返了。无疑的，中国人民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道路，对于一切爭取解放的被压迫民族，一定会发生愈来愈大的吸引力。

中国人民的敌人，不仅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統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买办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統治的同盟者。封建剝削制度是中国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和落后的根源，是我們国家独立、統一和富强的基本障碍。中国人口的最大多数是受地主阶级封建压迫和剝削的农民。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軍。因此，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坚决地領導农民，放手发展农民运动，团結了广大农民，并且根据中国的具体特点，在农村中組織了革命軍队，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进行了长期的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这样，工人阶级就同农民結成了巩固的联盟，把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进行得异常彻底，永远剷除了帝国主义統治中国的墙根，并且在这样可靠的基础上，为后来把民主革命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

民主革命實質上就是农民革命。必須发动农民，坚决进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才能組織起一支强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否則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是軟弱无力的。所以，农民问题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心問題。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領導真正的农民革命，才能领导农民彻底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才能把广大农民充分发动起来和組織起来，結成强大的工农联盟。只有依靠这样一个工农联盟，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現代，农民问题是不能指望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彻底解决的。资产阶级不能領導真正的农民革命。他們不敢也不願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甚至采取反对的立場。他們为了緩和农民的不滿，最多只能提出一些改良主义的土改法令，但是他們害怕农民群众的覚悟，害怕工人农民这两个革命阶级結成联盟，害怕农民的土地改革运动超出资产阶级利益所允許的范围。而当农民起来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他們就会同地主阶级勾結起来，镇压农民运动。因



此，在资产阶级领导下，不可能彻底战胜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

毛泽东同志说过：“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①我们的民主革命，不同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的胜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亚洲、非洲出现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独立国家，有着根本性质的区别。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在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没有取得革命领导权，因而独立后的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的手中。在这些国家中当权的资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等等方而，起着一定的历史进步作用。他们对待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有进步性、积极性的一面，又有动摇性、叛卖性的一面。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可以走一段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路程，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反帝斗争和保卫世界和平斗争中的朋友。但是，资产阶级毕竟是资产阶级。在它掌握政权的时候，不可能采取坚定的、革命的路线，只能采取动摇的、妥协的路线，因而这些国家不但根本谈不到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且，也不可能彻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不仅如此，就是已经取得的民族独立，也是不巩固的，在国内反动派的进攻之下，常常有倒退回去再次丧失民族独立的危险。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原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一个典型。实现这个转变的根本条件，是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紧紧地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中国革命就是这样。在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中国工人阶级就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从而使民主革命不间断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说，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同时，就解决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权问题。

有人曾经怀疑，在一个经济落后的中国，能不能很快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能不能很快地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任务？要不要走一段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国革命的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驳倒了这种错误看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由于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并把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企业国有化，这就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任务完成之后，紧接着就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实证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不但完成得很快，而且完成得很顺利、很彻底。

有人曾经以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和贫困落后的国家，要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当中国人民挣脱了重重枷锁，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人民群众成了土地和机器的主人，从被迫劳动变为自觉劳动，人口众多就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和文化更迅速发展的极重要的因素。“一穷二白”的状况，反而激发了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发奋



图强的坚决意志。这就出现了我国经济建设高速度发展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之后，伟大的中国人民发挥了冲天的革命干劲，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群众运动，创立了具有无限生命力的人民公社，造成了我国工农业生产的持续跃进。今天，谁都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强国的热切愿望，是能够实现的，并且用不着过去所设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

毛泽东同志说：“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那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①

在世界资本主义已经没落，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都已走到了绝路的时代，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比繁荣昌盛的时代，一个原来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的人民，只有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而且只有把革命推向社会主义才是出路。在某些亚非国家中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想走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来发展经济，并且美其名曰“民主”的道路。事实上，走这条道路的结果，并不能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而且还有可能出现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互相勾结的官僚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的发展只能是很迟缓的和痛苦的，国家工业化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更谈不上根本“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样，归根到底，就逃不出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束缚。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在帝国主义各国中，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在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落后的俄国，迅速地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先进的工业国。这是第一次向全世界证实了社会主义制度无比的优越性。伟大的苏联，以活生生的社会主义榜样，不仅使那些公开保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遭到了破产，而且使那些冒充“社会主义”而为资本主义效劳的第二国际叛徒们遭到破产。解放前的中国，是比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更加贫困更加落后的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上一日千里地前进。这是又一次向全世界证实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中国的实际经验，使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们能够进一步地了解，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冒充的“社会主义”，都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

中国人民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人民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经验，是经过长期的、复杂的、各种形式的群众斗争经验的总结。很自然的，这些经验中的重要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国际意义的。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出版社版，第14页。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11页。



中国人民的胜利，更加巩固了和扩大了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中国革命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占世界人口大约四分之一的中国，脱离了帝国主义的后方地位，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就进一步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团结、经济上不断的共同高涨，已经永远地打破了世界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包围，并且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在地球的一大片土地上生了根，成为不可战胜的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同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联系起来的桥梁。由于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同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进一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可靠基础。

中国人民的胜利，加速了帝国主义的死亡。旧中国是帝国主义虎口中的肥肉，新中国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打虎英雄。旧中国是帝国主义的后方，新中国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前线。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动派对中国人民的胜利，表示极端的仇恨。这是因为，他们失掉了一个可以继续剥削中国人民的市场，他们害怕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害怕资本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最后消灭，因而影响到世界资本主义的最后命运，害怕中国人民的胜利和成就对于被压迫的国家和全世界人民产生无穷的吸引力；而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人民的胜利，改变了西方资产阶级历来散播的反动的旧观念，什么有色人种都是劣等民族，什么只有白种人才是优等民族，什么落后的东方，什么先进的西方等等。实际上，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是有色人种，还是白色人种，人民总是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只要人民一旦成为社会的主人，也不论是白色人种或有色人种，都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中国人民的胜利，更加证实了伟大的列宁的名言：先进的东方，落后的西方。上升的太阳是在东方，没落的太阳是在西方。

中国人民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以自己的胜利，每时每刻向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大众发出召唤：帝国主义大倒其霉的时代已经到来，寿命不长了的帝国主义是完全可以战胜的，而且一定要被战胜的！没有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人们可以生活得多么美好！社会主义制度蕴藏着多么大的生命力！中国人民的每一个胜利都在为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大众大鼓干劲，而为帝国主义大敲丧钟。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催促着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走向坟墓，鼓舞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鼓舞着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鼓舞着一切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人们。中国人民的胜利，大大增强了和鼓舞了全世界保卫和平的力量。我国一贯坚持互不干涉内政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但是，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我们的前途光明灿烂。中国人民同苏联人民一起，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一起，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一起，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一起，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起，肩并肩，手携手，向着和平和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胜利前进。



歌頌人民公社

——为庆祝人民公社一周年而作

陶 鑄

在举国欢騰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我們同时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庆祝人民公社建立的一周年。

去年八月，党中央頒布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以后，办公社的热潮，风起云涌，势不可挡。在广大农民的积极要求下，不到两个月的時間，广东省近二万个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就組成了七百七十二个(后来調整为一千一百零四个)人民公社。

一年来，广东省的人民公社，不但和全国的公社一样，表现出人民公社所特有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使群众的生产热潮空前高涨、农村生产力迅速提高、农村面貌起着惊人的变化，而且经历了一场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的考驗。在这一考驗面前，我們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人民公社是台风吹不垮，干旱旱不垮，大水冲不垮的，而且正如虎門公社的社員們所說的，“就是原子彈也炸不垮”的！

今年春夏之交，广东的雨量特别多。河源、惠阳、增城等县，一个月內的雨量都在一千几百毫米以上。东江、北江、西江江水同时暴涨，最大洪峰水位超过几十年来的最高水位。东江中下游大部分的县都遭受到严重的水灾。全省先后受淹的稻田共达五百八十多万亩（还不包括倒伏、发芽的在內），房屋倒塌二十多万間，大小堤围被冲垮六十余条，决口三百七十余处。但是，我們的年青的人民公社终于战胜了这样严重的灾害。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時間內，在护堤、搶險、复堤、救济、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等方面，都充分地显示出人民公社的回天之力。这里可以举几个公社为例。博罗县鉄場公社，在洪水到来的时候，公社党委統一調拨了二百五十多只船，挑选了身强力壮的青壮年六百九十八人，組織了二十一个搶救队。經過两天一夜的搶救，救出了二千九百多人(沒有淹死一个人)，一千多头牛，七千九百多担种子，一千多头生猪以及大批其他財物。在洪水过后，他們又利用旧屋料修建房屋三百多間，使五百多戶灾民有屋可住。增城县的石滩公社，在抗灾恢复生产中，也充分显示出它的强大无比的力量。在洪水泛滥期間，这个公社的两条保护万亩以上田地的大堤围和六条中小堤围已漫



頂崩塌，加上其他毀坏的水利工程，要做六十五万土方的工程，才能完全恢复起来。为了保证晚造的插秧，又必須在大暑以前二十天時間內先做完二十八万土方。堵口复堤工程既是这样艰巨，还要把晚造田全部种上，而時間却只有短短的一个多月，劳动力只有那么多，如果不是办起了公社，那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石滩公社在这項巨大的战斗任务面前，根据互助互利原則，調动了二十九个生产大队(一个大队相当于从前的一个高級农业社)的力量，出動五六千人，按时完成了这一工程。晚造插秧也做到了不违农时，并且比去年提早了一个节气，多种了几千亩。又如博罗县的龙溪公社，在洪水过后，把全公社的技术力量集中使用，仅三天時間，就基本修好了临时性的住宅。他們組織了四十二个重建家园的基建队，到处帮助社員重建新屋。鷄、鴨、鵝种苗的生产不但迅速恢复，而且成倍地超过灾前的数目。文教事业也比以前办得更好。灾前全公社入学人数三千一百多人，現在增加到五千人。十八所小学的校舍全部給洪水冲掉了，但在二十天的時間內，不仅全部重新修建起来，并且多建了三所，还扩建了一所农业中学和一所普通中学。象这一类“人間奇迹”，决不只出現在少数几个地方，而是普遍地出現在我們所有受灾的人民公社。事实証明，人民公社是再大的洪水也冲不垮的。

与珠江三角洲地带遇到百年来所沒有的大水灾的同时，在潮汕、海南、湛江等地区，也都遇到严重的水灾或旱灾。九月初，十級台风在海丰登陆，汕头地区又一次降下两百毫米暴雨，以至造成特大的水灾。但是，所有这些严重的自然灾害，都沒有把我們的人民公社摧倒，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艰苦的磨煉，却更加显现出它的强大无比的威力。

在一些对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信心不足的人和失去信心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看来，在这样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我們的处境大概是极其可慮，甚至是无可挽救了吧？事实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有了总路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使得我們不但經得起任何灾害的折磨，而且在这无情的折磨之下，我們仍然能够以巨人的步伐昂首前进。

拿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广东省国民經济計划完成的情况来看，我們的情况是很好的。工业生产方面，据初步統計，上半年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五十七。許多产品的产量去年已有很大增加，但是今年上半年的增长仍然很快。如鋼一万一千七百万吨，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长五倍多；生鉄十万三千吨，增长十五点八倍；原煤二百四十二万吨，增长二点七倍；木材(运出)一百零四万三千九百立方米，增长百分之八点七九；水泥(包括土水泥)二十万零五千九百吨，增长百分之二十七；发电量三亿六千六百万度，增长百分之五十一.二四；糖三十五万四千吨，增长百分之九.九；机制紙四万一千四百吨，增长百分之二十二.二六；等等。在基本建設方面、交通運輸方面、商业方面，今年上半年也比去年同期有很大增长。

农业生产方面，今年上半年夏收粮食和經济作物虽然因为遭到了水灾，加上种植面积有些縮小了，因而总产量比特大丰收的一九五八年有所减少，但单位面积产量同丰收的一九五七年間期相比，还增加百分之九.一，其中稻谷增加百分之九.三。現在的情况是：灾区的



田地已經全部搶种。广大干部和群众，决心要夺回上造的損失，把稻田都种植得很好。全省晚稻的种植面积也大大增加，而且比去年插得早、插得好。在开展反右傾、鼓干劲运动以来，每天有七、八百万人出动田間，追肥护苗，做好田間管理工作，所以晚造的三类禾大大减少，禾苗比去年长得更好更壯。如无意外的大灾害，一个更大的晚造丰收肯定就会到来。今年的总产量估計仍有可能比特大丰收的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十左右。水产总产量今年上半年是三十九万二千二百吨，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农村的副业，主要是家庭饲养业，在建立公社初期由于安排不当，并且受到水灾的影响，曾經有些下降，現在已經迅速恢复过来。

以上种种无可爭辯的事实証明，我們的步伐决沒有因为严重灾害的影响而緩慢下来，我們的经济发展依然保持着大跃进的速度。特别是由于重工业的发展，使广东省一向极为薄弱的基础工业初步改觀，物質技术基础大为增强。这是广东整个国民經济带有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在目前可能还有些人看不清楚，但它很快就会向人們証明，广东的經济发展正在走向一个嶄新的阶段。

一年来广东省人民公社的經歷，异常有力地回答了那些对总路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抱有怀疑态度和反对态度的人們。試想一下：如果沒有人民公社，沒有广大群众对人民公社的衷心热爱和坚决拥护，我們在这一場同历史上少有的险恶的自然灾害的斗争中，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嗎？能够在重灾之后依然保持生产大跃进的局面嗎？特別在农业方面，受到这样巨大的自然灾害的袭击，不仅要把早造的全部損失向自然索取回来，而且要爭取全年总产量仍能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十左右。如果沒有具有无比优越性的人民公社，我們敢于发出这样惊人的豪語嗎？一年来的事实，无可爭辯地証明了，象这样具有坚强的生命力，这样能够为人民造福，这样为人民所热爱的人民公社，是决不会垮台的。它已經是根深蒂固，坚如磐石了！

二

广东省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的一年，是惊天动地的一年，是生产力大发展、人們的精神面貌大改变、社会主义建設发展空前迅速的一年。从这一年的事实中，我們看出，人民公社不但是我国建成社会主义、而且也是将来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的社会組織形式。

使我国迅速地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現代工业、現代农业和現代科学文化的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进一步使我国迅速地具备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条件，尽早地过渡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时代，是我們共产党人的希望，也是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希望。但是，怎样才能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公社又和这一伟大的希望有些什么关系呢？党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中，曾經明确地指出过，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是：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質极大地提高；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三个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



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消失,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逐步消失;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当然,要全部达到以上的条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通过一年来人民公社的实践,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这些方面的萌芽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看出这个未来的伟大理想的远景。

首先从生产上看。在农业方面,我们已经说过,人民公社既能高速度地增产粮食,又能发展多种经营。一九五八年是大跃进的一年,这一年全省粮食的核实产量为三百二十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七十六亿斤,比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产的总和五十五亿斤还要超过二十一亿斤。虽然今年早造比一九五八年早造稍有减产,但是,晚造只要不遭受象上半年那样大的自然灾害,全年总产量就能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十左右。这样的增产速度,当然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分不开的。有一些未遭受大的灾害的公社,今年依然保持着去年大跃进的增产速度。根据这些公社的情形来看,全省要在几年之内,粮食以一九五七年为基数翻上一番,是完全可能做到的。例如全省闻名的樟市公社,去年在粮食增产上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而今年早造在去年跃进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水稻总产量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十五点七。连阳县的屋子公社,今年早造每亩平均稻谷产量五百二十二斤,总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点九。阳江县的海陵公社,在战胜五次暴风雨、两次强风和一次大虫害后,平均亩产仍达到四百二十五斤,与去年同期比较,亩产增加百分之三十二点八。象这些公社,能在去年那么大的跃进的基础上又增产这么多,预计到秋后分配时,除掉商品粮后,每人每年用粮留粮可以达到千斤的水平。这是多么惊人的变化呵!这些公社能够做到的,别的公社当然也可以做到。在广东,只要今年晚造来一个大丰收,基本上实现全省亩产八百斤,到一九六二年全省解决粮食问题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上面这些公社,有的是在山高水冷地方,有的过去土壤贫瘠,自然条件并不好,然而它们在公社的优越性得以发挥的条件下,增产幅度这么大,其他地区自然条件较好的公社,如果不是遇到特大的灾害,完全可能达到更高的水平。解决了粮食问题以后,农林牧副渔的多种经营,就会有更大的发展,从而会更加推动工业的大发展,也会随之加速农业机械化的实现。那时我们工农业生产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将是怎样的呢?从上面所说,难道还不可以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吗?

广东工业基础本来是薄弱的,但是经过去年以来的跃进,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去年以来,很多重要的工业产品几倍、几十倍地增加,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当然,工业的发展,不单是靠人民公社的力量,但是,发展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劳动力却和人民公社有着密切关系。去年大炼钢铁、挖煤、修路,是和农村中秋收、深翻土地、大修水利同时进行的,这就需要很多劳动力。如果没有公社化,要这样最大限度地调动和使用劳动力,是办不到的。而且可以肯定,人民公社化以后,为工业上贯彻洋土结合、大中小结合的方针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这将会大大加速我国工业化的步伐。

人民公社建立以后,三、四个月的时间就使农村中的小工厂成千成万地兴建起来。社办



工业的主要项目有电力，煤炭，有色和黑色金属，化学，水泥，纺织，建筑材料，机械，食品等。今年上半年公社工业的总产值为六亿九千多万元，比去年同期的三亿多元增长近一倍。这里可以举花县花山公社为例。公社化以前，全公社范围内只有三个破破烂烂的小工厂，但是在公社化之后，就迅速地兴办了四十八座厂矿。这些厂矿在今年除了供给公社价值五十一万元的农具、农药等物品之外，还用去冬和今年的部分利润，给公社买了十三部拖拉机，一部载重汽车，三部发动机，一部抽水机。工厂还制造出三十二部马车，七千多部手推车。花县其他的公社，也和花山公社的情况差不多。全省象这样的公社为数并不很少。公社工业的发展，对于加速农业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对于供应农村人民生活的需要，将会起重大的作用。

公社化后，全省的水利建设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从去冬今春以来，全省共兴建了水利工程五万四千多宗。农田受益面积近八百万亩。其中受益面积万亩以上的工程，已完成的有七十五宗，尚在施工的还有二百多宗。大跃进和公社化以来，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完成水利工程十四亿四千万土石方，占解放后十年来总共完成的十七亿二千万土石方的百分之八十三强。农村水电事业今年也发展得特别快，全省自解放以来到一九五八年十月，建成的小型水电站有二百一十处，容量三千六百多瓩，但是从去冬到今年六月，短短的八个月时间里，就完成了中小型水电站一百二十三处，容量为二千五百瓩。去冬以前，全省万亩以上引水蓄水工程共三百一十六宗，但是去冬以来开工的就有三百四十一宗。过去九年来，限额以上的水利工程只有二宗，去冬以来共有二十四宗。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一年来的水利工程，比过去九年的总和还要多。我们可以想见，这对今后农业生产将起多么重大的作用。为什么去年能搞这样多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国家投资增加了些是一个因素，但主要是由于建立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集体的作用远远超过过去农业合作社那种小集体的作用，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实行大协作，统一安排劳动力和调出更多的劳动力。大协作不仅在生产上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加强了社员的集体观念，培养了社员的共产主义思想，提高了社员的政治思想觉悟。至于大的水电站、水力站的建成，在促进农村电气化、机械化方面的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

公社公共福利事业的举办，使长期以来被缠在家务事中的妇女解放了出来。这不但使生产上增加了大批劳动力，而且使这些妇女们的精神面貌有着很大改变。她们过去所关心、所斤斤计较的是自己那块小天地，现在是越来越关心集体的事业了。现在全省建立公共食堂近十万个，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每个公社都建立不少。广大贫农、下中农、青年男女农民是积极拥护公共食堂的。有些地方由于干部没有把积极办好作为根本原则，而片面地强调自愿参加，曾经散了一些食堂，但是群众自己又办了起来。全省有不少生产队，由开始到现在，全体社员都在公共食堂吃饭。这些公共福利事业的举办，一方面当然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生活；另一方面也将在社员们的思想上起着很大影响。如果说今天有些人对这一点还看不清楚，那末



随着时日的推移，他们会越来越看得清楚。

在分配制度上，广东各公社现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基本口粮供给制或者基本口粮半供给制，其余的不到百分之三十的大队，只实行对困难户的补助。我们打算在秋后全省的人民公社都实行基本口粮供给制或口粮供给制，只搞少数的伙食供给。这种制度对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有好处，可以使全体农民得到最可靠的社会保险；同时，这种制度本身还包含着共产主义的萌芽。经过一年来的实践，证明实行这种制度，不但对困难户有很大帮助，就是对绝大多数社员也有好处。顺德县的杏坛公社，由于生产的不断增长，在实行了工资制和伙食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以后，从公社成立到现在，始终保持了每人每月平均伙食费四元五角，每个劳动力平均每月工资二十七元的水平。而在这个公社原范围内，公社化以前还有不少超支户，实行这一制度以后，超支户就完全没有了。

现在每个公社都有了一点“家当”，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公社直接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这些虽然还只是开端，但将会发展得很快，正如人民日报社论“人民公社万岁”中所说的，这正是“代表着我国农村的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发展前途”。番禺县的南村公社，到一九五九年上半年为止，已经有了一百万元的公共积累。三水县的河口公社，从建社以来到今年六月份，公社积累了八十多万元，比原范围内各农业社历年来的积累总和还要多九万多



田间学习（套色木刻）

朱喟画



元。誰都明白，依靠公社积累的不断増加，就可以促进扩大再生产，可以更快地帮助穷队发展生产，可以为今后农田基本建設准备財力，可以更好地发展公共福利事业。有些近視的人，只看到公社現在仍然不够富裕的一面，他們不知道只要假以時間，譬如十年左右，絕大多数公社都将成为拥有巨大財富的社会基层单位。

公社化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公社里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必然会逐步地发展起来，这給国家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这一年来，广东全省公社所举办的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对全民科学文化的普及和提高，起了很大作用。自然，这些学校和研究机构在开始的时候，質量是比较低的，但是它必然会逐步提高。若干年后，公社是可以办起专科学校的，那时我們国家的学校，中央办，省、市、县也办，公社则可以到处办。这样，不仅能够彻底消灭文盲，而且进一步使大家都变成各种不同程度的知識分子，也大有希望了。可以断定，将来千百万拥有一定科学文化水平的知識分子，将会从这里涌现出来。这就給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基本消失，逐步創造了条件。

由此可見，一年来的事实，不但說明公社已經象磐石般的巩固，而且說明，公社是使农村的社会物質財富迅速增長的泉源，是使人們政治思想水平不断提高的学校，是共产主义萌芽得以成长壮大的园地。这正是一个使我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組織形式，这正是我們的伟大希望所在。一切悲觀論者，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是看不到这些的，他們对公社优越性的种种怀疑是完全沒有根据的。

三

如日方升的人民公社，既然是中国人民伟大希望之所在，它的产生、成长和壮大，必然会遭到中国人民的敌人的憎恨和咒罵，特别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的咒罵。在今年夏天，广东省遇到前所未有的大水灾时，他們这种咒罵的猖獗之声更是达到极点。我們共产党人向来是不怕敌人造謠誣蔑的。因为我們所做的是前人所沒有做过的神圣的事业，是一項光荣无比的伟大事业，真理是在我們这一边。在真理面前，一切妖魔鬼怪，是无法施其伎俩的。我們人民公社所放射出来的灿烂光輝，一小撮人的黑影是无法遮挡得住的。

帝国主义者和各种反动派把人民公社說得漆黑一团，誣蔑人民公社“破坏家庭”，是一种“奴役制度”，并且造謠說，“人民公社垮台了！”“人民公社大失敗！”于是乎，他們心里也不由得一陣“好生欢喜”了。但是事实是怎样的呢？他們这种自欺欺人的漫天大謊又能够起多大的作用呢？事实証明：人民公社所显示出来的是前所未有的优越性，人民公社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广东省的人民公社，从开始到现在，一个也沒有少，一个也沒有垮。一九五六年，我們在开始搞合作化运动的时候，因为沒有經驗，曾經遇到了一些暫时的困难，退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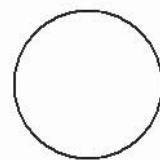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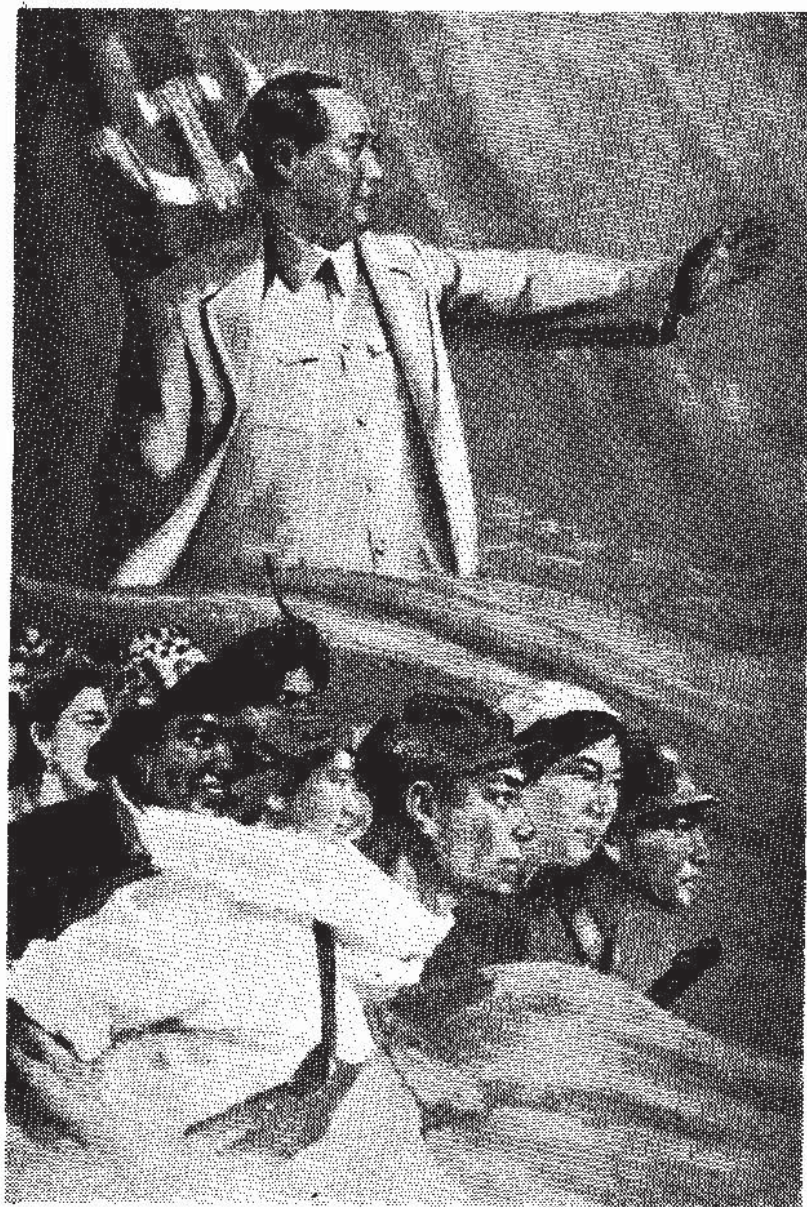
有百分之一点一六，那时反动派正如今天一样，大肆造谣，说什么合作化使“天怒人怨”了，说什么“合作社垮台了！”“共产党垮台了！”当然，事实怎样地回答了他们，而他们的可耻叫嚣又怎样消沉下去，已有历史的记载。不过现在他们的运气更坏了，我们的人民公社，不但没有因为遇到一些局部的暂时的困难而垮掉一个，反而经过了特大的洪水灾害，锻炼得成长得更加坚强壮实了！铁一般的事实，把那些帝国主义者及其大大小小的应声虫的无耻叫嚣一扫而光。国内外反动派对我们人民公社的造谣诬蔑，只是更加暴露了他们的丑恶面目，更加显出了他们的内心恐惧。

在我们的人民公社日益发展壮大的事实面前，帝国主义者和各种反动派又说：“人民公社虽然还有，但已名存实亡了。”什么是人民公社的“实”呢？人民公社的实，就是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所规定的，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比农业合作社大得多的工农商学兵的统一组织，它是多种经济事业的经营者，是集体生产的组织者，同时又是集体生活的组织者，它兴办各种企业和事业，它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它包含着共产主义的萌芽，公社的所有制中，包含着某种全民所有制的成分。所有这一切，是过去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所没有，也是这一年来经过了整顿后的人民公社所未曾缺少的。试问：如何就谈到“实亡”了呢？反动派过去攻击得最多、攻击得最厉害的是供给制、公共福利事业等，这些东西，现在没有“亡”，以后也不会“亡”，而且还会随着生产的发展，更加发展起来，“兴”起来。至于谈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我们将来要实行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要在今天的人民公社里来加以实行，既然没有，当然就无所谓“存”“亡”了。是的，在开始办社时，我们由于缺乏经验，有的地方集中得多一些，供给制的比例大一些，这些，在整顿公社期间，已经给予适当的调整，使得人民公社更加巩固和发展。这和什么“人民公社后退”、“放弃人民公社”之类的鬼话，是毫不相干的。当然，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反动派为了中伤人民公社，硬想强加到我们头上来的东西，比如什么“破坏家庭”呀，“强迫劳役”呀等等，我们的人民公社过去未曾有过，现在也没有，将来也不会有的。反动派这样地大喊大叫，说我们的人民公社“名存实亡”，正是因为他们过去诬蔑人民公社的无耻谎言业已破产。他们的这种新的诬蔑当然也只会事实面前彻底破产。

滚滚前进的历史巨轮，一定会将那一小撮撒谎者、诽谤者压得粉碎。造谣咒骂是无损于我们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无法阻止人民公社的胜利前进的。古人说得好：“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老爷们，你们尽管叫嚷吧，我们决不会因为你们的叫嚣而有所顾虑，有所犹豫。人民公社一定要光芒万丈地发展下去，一直到共产主义的胜利到来。任何时候，我们都是坚决地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胜利红旗高高举起的！

（本期封面设计：张光宇 封面雕塑是东北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的集体创作）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前进!

尹戎生作

